

吉坡星火

马来亚吉打地区人民抗日斗争史实

林一叶 编撰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

序

人民是社会和历史的创造者与主人，人民创造英雄，英雄是特定部分人民的代表人物。1300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告诫儿子们：“水可载舟，亦可复舟”。魏征也据此提出谏疏：“可畏惟人”。几千年历史的结论是：人民不可欺侮。

吉打州与玻璃市州人民抗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汪洋怒涛中，仅是微小的几排岸礁激浪，然而这几排岸礁激浪却包含着人民抗暴斗争广泛且深刻的基本经验和普遍真理。

堂雀虽小，腑脏俱全。吉玻人民的抗日斗争，雄辩地说明弱小民族可以打败强大的侵略者，受压迫人民可以打败强大的统治者，条件是要人民觉醒奋起，战略策略正确，领导核心坚强。内因是决定因素，环境周边形势虽然重要，但终究要通过主观的努力、决策、行动起作用。

田单率领人民驱逐燕军恢复齐国，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导致击灭强秦，元末农民起义推翻曾经称雄欧亚大陆的强暴元朝；美国人民驱赶英国统治者的独立战争，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革命，亚非拉被奴役弱小民族击败帝国主义殖民者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都是人民必将最后胜利的铁证。古今中外依靠人民力量战胜强大敌人的实例不胜枚举。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70%的陆军，深陷中国全民抗战泥淖无法自拔，日本马来军政部总务部长滨田上佐哀叹：“中国问题使日本陷入泥沼，举凡日本的国力和军力都消耗殆尽”。这是日

本御前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的根本原因。原子弹的威力，苏联军队击溃日本关东军，都是加速日本投降的外加因素。不能将军队与人民切断密切关系，苏联军队依靠全体人民敌忾同仇，极力支持，不断补充扩展苏军战斗员，得以最后战胜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军队，扭转欧洲战局。《吉玻星火》首先表达人民当中蕴藏着潜在的巨大力量，蕴藏着坚强的骨干力量，蕴藏着无穷的再生力量。

马来亚人民最早拿起武器抗击日本侵略军，是在1941年12月下旬，吉玻和霹雳已经分别组成抗日游击队，雪兰莪、森美兰、柔佛等地继于次年元月建立抗日武装组织，较大规模的对日军作战，是由新加坡星华义勇军开始。新加坡各界华侨抗敌动员大会武装部（主任马共党员林江石）于1942年2月1日正式编组星华义勇军，报名华侨男女青年3000余人，因武器太少，只编7个连队，其中4个连队上前线，顽强战斗，给进犯日军重大打击，牺牲百余人，在英军决定弃守投降后，2月12日义勇军被令解散。

马来亚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最初各地分散成立的抗日游击队，总数不超过千人，在非常艰苦危难条件下，顽强拼搏，浴血苦斗，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从战略防御过渡到战略相持，作出重大牺牲，在准备转向战略反攻时刻，日本宣布投降，终于取得最后胜利。战斗比较频繁激烈的是柔佛州南部的第四独立队、霹雳州的第五独立队和雪兰莪州的第一独立队。吉玻的第八独立队，对比下战争规模和次数，都比较小些少些。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有 8 个独立队，下辖 33 个中队，1 个直属分队，公开队与秘密队合计指战员共 9900 多人。加上抗日后备队、自卫队等武装组织，由华侨男女青年为主组成的抗日战士，总数超过 25000 人（其中有几十个马来、印度和土著民族青年），尚有奋不顾身的抗日民运工作者及抗日同盟会会员 20 几万人，在日军侵马期间，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日本军警进行规模大小不一的战斗 340 多次，毙伤敌人 5500 多人（包括日军、警探和民族败类）。全部抗日战士及工作者牺牲 3000 多人。

以中国国民党党员为骨干的华侨抗日军（日军侵马初期，个别由马共党员领导的抗日武装小队，也曾暂名华侨抗日军），多数活动于吉兰丹及霹雳北部，总数 300 余人。1945 年 12 月 1 日部分先复员，次年 6 月底余部 150 人才复员。其中第十三中队对日作战（包括锄奸和铲除警探）11 次，毙伤敌人 50 多人。

1945 年 6 月间，联军东南亚总部空降英人尉官在吉兰丹山区，组织马来人游击队 110 余人，进行训练，受日军进攻而奔散，以后召回 80 余人。不久，日本投降，马来连队尚无作战机会。

1943 年 5 月，东南亚联军开始派遣几个一三六部队队员乘潜水艇在霹雳州登陆，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取得联系，搜集情报，以无线电和联总联系（不参加作战）。1945 年 2 月以后，较多空降于山区人民抗日军驻地。前后到达马来亚的一三六部队成员 137 人，其中由重庆派送的华侨青年 49 人（编号龙组），余为英美澳等尉官。在联总与人民抗日军之间，进行沟通联络。1943 年 12 月 31 日，代表联总与马共及人民抗

日军、人民抗日同盟会代表签订合作抗日协约。1945年5月联总开始空投武器及物资给人民抗日军。一三六部队的华人龙组成员发挥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各州都有群众自发组成的抗日队伍，总数十几队，多数只有十几人，纪律严弛不一，基本上先后为各该地人民抗日军所收编。吉兰丹州布劳的冯成部队40多人收编后，成为抗日的坚定力量。另有20几股私会党徒组成的武装组织，假冒“华侨抗日军”，实际不抗日，而是打家劫舍、勒索居民、奸杀掳掠、残害群众。人民抗日军教育争取其中部分成员，加以收编或遣散，对坚持作恶的匪徒即武力围剿，对半路港的蒋石波、杨广两股匪徒约80人，消灭及俘虏近半，余众逃散。抗日后期，土匪祸害，大部分被清除。

在3年8个月的抗日战斗中，吉玻人民的抗日武装，同样经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立了和广大抗日群众密切联系的严密军民同盟关系，抗日后期也先后与联军一三六部队建立了联系，大体上和各州人民抗日斗争有着同一的发展规律。主要由于地缘关系，吉玻人民抗日斗争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由于沦陷时间较早而且事变突然，马共吉打特委及反法西斯同盟，措手不及，未能部署组织抗日武装和调整撤退，受到较大摧残破坏，与马共中央3年间极少联系，吉玻的抗日斗争，全靠独立作战，自力更生，更能显示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自觉性和自动性。吉玻人民武装抗日斗争，也有有利的一面。马来亚米稻生产面积36万公顷，每年大米产量约42万吨，仅够全部居民消费量的47%左右，吉玻两州的稻田面积和大米产量都占全马的一半。加以毗邻盛产米粮的泰国南部，

因此以农村、胶林、矿场为主要游击区的人民抗日军，粮食供应情况比其他州埠充裕。玻璃市州北部，吉打州北部和东北部都和泰国南部的丛山荒林连成一片，使抗日军有更广阔的周旋进退余地。日军兵力严重不足，只能控制点线的城镇与交通线，抗日军在广袤农村胶园，游击行动范围宽广，有利于组织群众协同抗日。加以泰马两个民族存在历史芥蒂，日本将吉玻划让给泰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对马来民族的欺骗与利用效能，减少抗日游击战争的阻力，方便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吉玻星火》严格遵照史志据事直书，如实记述的原则，反复查对核实，务求准确翔实。这是吉玻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血泪与铁火混交的实录史。参加座谈或书面提供资料的是50几年前亲身参加武装抗日战争或各种形式抗日斗争的30几名老战士，有党代表、中队长、副中队长、政工员、小队长、战士、别动队员和抗日同盟会、民运工作的负责人员及各战线的抗日工作者，都是65岁至85岁高龄的战火幸存者。彼此互相对证核实，整理时间长达4年，其中7人来不及亲睹编印成册竟先逝世。谨向这几位老战友表示衷心敬悼。

日治期间，吉玻及栢城英勇牺牲的抗日战士及抗日工作人员约500多人，被日军杀害和酷刑致死以及病饿殍死狱中的无辜华侨总数4000多人。而书后所附“吉打州玻璃市州及栢城市部分抗日烈士名录”只有67人，绝大部分牺牲者已成无名英雄和无名罹难者，我们深感遗憾，希望知情者能够提供资料（包括烈士的原有姓名、籍贯），以便日后加以补充。书中罗列较多抗日战士名字，他们绝大多数续后在反抗英帝

国主义殖民统治、为争取马来亚人民的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和广大抗日烈士及日治时期罹难人民一样，将为马来亚各族人民所钦敬与悼念。

英勇壮毅的抗日烈士们虽死犹生，永垂不朽！

林 一 叶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目 录

序	(1)
一 抗日活动 历史溯源	(4)
二 发动群众 全民抗日	(10)
(一) 日军的血腥统治与经济掠夺	
(二) 人民奋起反抗侵略	
三 人民武装 发展壮大	(29)
(一) 吉打东乡人民抗日部队	
(二) 吉打北乡人民抗日部队	
(三) 与泰国人民抗日义勇队联合作战	
(四) 联军与人民抗日军的联系	
四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73)
五 日本投降后 斗争在延伸	(81)
(一) 胜利余波	
(二) 人民委员会	
(三) 针锋相对	
(四) 开展和平民主斗争	
跋	(109)

附：参加编写或提供资料口述者资料

朱战士

吉打玻璃市州及檳城等部抗

日战士姓名

吉玻星火

马来西亚吉打地区人民抗日斗争史实

马来西亚吉打州 (KEDAH) 和西北紧邻的玻璃市州 (PERLIS)，位于马来西亚的西北部，州界三分之一接联南面的霹雳州 (PERAK)，州界三分之二在东面和北面毗邻泰国 (暹罗)。吉打州面积 9479 平方公里，下辖 10 个县；玻璃市州面积 803 平方公里。两州的山岭丘陵和原始森林，约占总面积的一半。1941 年两州的总人口约 58 万人，其中马来人约 38 万人，华人约 10.79 万人，印度人约 7 万人 (注①)。最大的城市，吉打州首邑阿罗斯打 (Alor Setar) 人口不足 5 万人。以米较 (碾米厂) 和锯木厂为主的小型工厂总数不足 50 家。两州面积仅占马来西亚总面积的 8%，粮食总产量每年约 20 多万吨，占全马总产量的 50% 左右。

吉打州西南部的威利斯省 (Wellesley) 和隔海相望的檳城 (PENANG)，于 1786 年被英国占领以前，原属吉打辖地。主要是由于地理接近的原因，吉打和檳城之间，华侨社会的关系相当密切。

檳吉处于马六甲海峡北端，且是优良港口，为中国和印度洋地区海上贸易航海必经之地。远古时代，中国商船往返狮子国 (锡兰)、天竺 (印度) 和波斯等地，要在吉打地区补给粮食及淡水，收购锡块，婆律香等方物，售予瓷品、丝绸，所以东周后期就有华人到达吉打。《梁书》、《南史》记载，梁武

本御前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的根本原因。原子弹的威力，苏联军队击溃日本关东军，都是加速日本投降的外加因素。不能将军队与人民切断密切关系，苏联军队依靠全体人民敌忾同仇，极力支持，不断补充扩展苏军战斗员，得以最后战胜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军队，扭转欧洲战局。《吉玻星火》首先表达人民当中蕴藏着潜在的巨大力量，蕴藏着坚强的骨干力量，蕴藏着无穷的再生力量。

马来亚人民最早拿起武器抗击日本侵略军，是在1941年12月下旬，吉玻和霹雳已经分别组成抗日游击队，雪兰莪、森美兰、柔佛等地继于次年元月建立抗日武装组织，较大规模的对日军作战，是由新加坡星华义勇军开始。新加坡各界华侨抗敌动员大会武装部（主任马共党员林江石）于1942年2月1日正式编组星华义勇军，报名华侨男女青年3000余人，因武器太少，只编7个连队，其中4个连队上前线，顽强战斗，给进犯日军重大打击，牺牲百余人，在英军决定弃守投降后，2月12日义勇军被令解散。

马来亚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最初各地分散成立的抗日游击队，总数不超过千人，在非常艰苦危难条件下，顽强拼搏，浴血苦斗，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从战略防御过渡到战略相持，作出重大牺牲，在准备转向战略反攻时刻，日本宣布投降，终于取得最后胜利。战斗比较频繁激烈的是柔佛州南部的第四独立队、霹雳州的第五独立队和雪兰莪州的第一独立队。吉玻的第八独立队，对比下战争规模和次数，都比较小些少些。

质、文化观念、语言与价值观点、生活习俗，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长期显示出强韧的民族凝聚力。

日军、人民抗日同盟会代表签订合作抗日协约。1945年5月联总开始空投武器及物资给人民抗日军。一三六部队的华人龙组成员发挥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各州都有群众自发组成的抗日队伍，总数十几队，多数只有十儿人，纪律严弛不一，基本上先后为各该地人民抗日军所收编。吉兰丹州布劳的冯成部队40多人收编后，成为抗日的坚定力量。另有20几股私会党徒组成的武装组织，假冒“华侨抗日军”，实际不抗日，而是打家劫舍、勒索居民、奸杀掳掠、残害群众。人民抗日军教育争取其中部分成员，加以收编或遣散，对坚持作恶的匪徒即武力围剿，对半路港的蒋石波、杨广两股匪徒约80人，消灭及俘虏近半，余众逃散。抗日后期，土匪祸害，大部分被清除。

在3年8个月的抗日战斗中，吉坡人民的抗日武装，同样经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立了和广大抗日群众密切联系的严密军民同盟关系，抗日后期也先后与联军一三六部队建立了联系，大体上和各州人民抗日斗争有着同一的发展规律。主要由于地缘关系，吉坡人民抗日斗争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由于沦陷时间较早而且事变突然，马共吉打特委及反法西斯同盟，措手不及，未能部署组织抗日武装和调整撤退，受到较大摧残破坏，与马共中央3年间极少联系，吉坡的抗日斗争，全靠独立作战，自力更生，更能显示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自觉性和自动性。吉坡人民武装抗日斗争，也有有利的一面。马来亚米稻生产面积36万公顷，每年大米产量约42万吨，仅够全部居民消费量的47%左右，吉坡两州的稻田面积和大米产量都占全马的一半。加以毗邻盛产米粮的泰国南部，

州续后成立分会。同年4月30日，南洋共产党在柔佛州浮罗加什岛上，由胡志明主持召开南洋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解散南洋共产党，成立马来亚共产党。反帝大同盟在马共领导下，组织逐渐扩大，吉打州工人和学生，部分成立小组，并成立反帝儿童团，开展反对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反对资本剥削，争取工人阶级合理权益，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积极开展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推动阿罗斯打、双溪大年（Sungai Patani）、居林（Kulim）和玻璃市加央（Kangar）等地区的抗日宣传、筹赈祖国难民、抵制日货等活动，组织“国哀日”活动，激发华侨挽救民族危难意识。

卢沟桥事变后，吉玻两州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迅速掀起新高潮。1937年8月16日，在陈嘉庚主持下，新加坡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下旬，在阿罗斯打召开吉玻两州华侨代表大会，成立吉打区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由陈荣树任主席，加央、双溪大年、居林分别成立分会，亚娄、班底、吉打港口、牛仑、孺乃、华玲、双溪牙兰、大铅等十几个华侨聚居小镇先后成立地方筹赈会，按地区划归各分会联系。当时负责筹赈会的头面人物，陈荣树、钟文贤、骆清河、黄玉钦、卢枢基、张茂树、黄树邦、郭六一等等，都是各地区比较殷实的侨领。吉打筹赈会秘书长是阿罗斯打新民小学校长、马来亚共产党员陈天华。

筹赈会以常月捐、卖花、卖纪念品、义演、特别募捐、大会临时捐献等等方式筹款。吉打州1938年就筹捐25万元叻币，义捐国币42.69万元，购买爱国公债23.89万元（后来全部献给中国政府），募寒衣3000件（每件折叻币3元），玻

璃市州筹捐 3 万元，义捐国币 66592.92 元，公债 14605 元，寒衣 1220 件。以后陆续增加。献汽车、献飞机 2 万余元，购广东、福建省公债，都是全马来亚统一安排，各州分别活动，款项交由新加坡筹赈总会汇交中国重庆政府。此外，还组织机工回国服务，全马先后组织 3200 来名汽车司机和机工回国，重点在滇缅公路服务，其中吉打 40 人，玻璃市 2 人，檳城 104 人。1940 年 3 月，南侨总会组织回国慰劳团，由陈嘉庚率领，41 名成员当中，吉打地区 1 名，是谭拔群，日本南侵后才发现是日本的潜伏特务。

1937 年 9 月，在马共地方组织领导下，新加坡、马来亚各州先后成立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抗援”），分为工人、农民、学生、妇女、文化界等系统，彼此并无领导关系，但有密切联系。抗援会的任务是发动各界群众，积极支持筹赈会的劝捐、募捐工作；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包括秘密贴标语、印发传单）；鼓动抵制日货，惩戒屡劝不改的奸商；秘密募捐援助新四军、八路军、琼崖纵队和东江纵队（“援四、援八”），将钱直接汇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吉打抗援会先后动员与协助数十个华侨热血青年回国从军参加抗日。抗援会为惩戒奸商与破坏抗日活动的民族败类，另组织锄奸团（实际是惩奸团），公开销毁奸商店中的日货，警告奸商败类，在奸商招牌涂乌油，散发传单公布奸商罪状，发动日资企业工人罢工，暗中破坏日资企业生产等等。锄奸团成员在吉打、檳城之间互相调动，檳华各界抗日锄奸团员张求进受警方缉捕，即调吉打，吉打陈亚辉受警局监视即调檳城（日治时期调动更频繁，朱丁、蒋成发等等由吉调檳，丫头、傅亚宁等等由檳调吉）。

锡奸团成员绝大部分是有组织的各业青年工人。1933年以后，马共阿罗斯打支部，从爱国华文教师及产业工人中逐步发展党员，先后组织米较工人、建筑工人、锡矿工人、橡胶工人、朱律工人、巴士（汽车运输）工人和各业店员互助会，渔业工人劳工联合互助会，工会组织在抗援会中发挥先锋和骨干作用。由于受到英帝殖民政策的限制与警探的监视，互助会章程上只能写明是工友间开展丧喜事和经济生活的互助，开展文娱活动。实际上工人互助会是团结工人、协调统一对资方开展改善生活待遇斗争行动，并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用合法酒瓶，装非法汽油。为掩饰类工会的互助会左倾色彩，米较工人互助会，特地选聘爱国厂主黄金乌任名誉主席。吉玻两州有组织的工人约近3000人，只占工人总数的10%左右，主要是华侨工人，印度工人很少，马来工人更少。当时吉玻工运的主要领导人是谢维汉、张云、容天润、陈真立等，后从霹靂州调来刘刚，从檳城调来张求进（张牙）。

阿罗斯打抗敌后援会先后由柯连务、伍仙护、张景章等负责，以米较公会和华侨中学为主要据点。双溪大年抗援会由黄志成、张声武等负责。居林地区各地由张云、陈古、陈鲁、黄易生、张田、陈海汀等分别负责。1940年底，由于英帝加强镇压，各地抗援会骨干大量被捕，根据全马的统一部署，抗援会停止活动。吉玻两州改为反帝大同盟继续开展抗日救国群众运动，并通过工人互助会、救国会、同乡会、宗亲会推动抗日救国活动。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挥军东进，侵略苏联以后，吉打反帝大同盟改名反法西斯大同盟。原抗援会核心骨干，多数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继续为抗

日救国发挥良好的鸣锣开道作用。阿罗斯打华侨中学校长李公仪（李维纲），积极支持进步教员李进洪、陈祖爱、陈德康、许逸似、陈天华、沈星云、张声武、王淮东、梁栋材、林亚当（金惠馥）、张景章、伍仙爱、蔡天定（朱丁）等等的抗日活动。华侨中学、育才学校、新生学校、文华学校、毓德学校、新民小学、南华学校等等华文学校，成为培养抗日爱国青年的摇篮，是日后吉打人民抗日军大批战士的哺育地。仙爱和景章等组织“业余话剧团”，公开挂招牌，带领学生办合唱团，组织文艺演出和街头活报剧。陈德康等每晚到店员互助会等社团，教工人、居民唱抗日救亡歌曲。组织学生进行募捐，援助八路军、新四军。

1939年，在钟运康、李进洪等老师指导下，成立学生抗敌后援会，由郑金利、黄文章、阎世居等直接领导北吉打学生运动，运用学生旅行团、歌咏队、话剧团等形式，在市镇和象屿、巴冬坑、十字港、甘光暹等等农村演出，进行筹款募捐，散发抗日传单，传播《论持久战》论点，教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进行曲”等抗日流行歌曲。郭沫若曾为他们题词勉励。

反帝大同盟属下，已经成立反帝儿童团，1941年改为反法西斯儿童团。年轻的学生运动骨干分子黄文章、郑开兴、黄马顺（董苏泉）、刘来芝、石金虎为阿罗斯打儿童团的核心，年龄在11—15岁之间，团结广大少年儿童，宣传纯朴的爱国思想，在散发传单、传递信息、了解警探和奸商动向方向，发挥比成人更加灵活、方便、隐蔽的机敏作用。他们伪装卖水果、香烟，到处游荡，将地下小报装在菜篮子里面，大摇大摆走过警探警戒地段。带动大量小学生把父母所给零用钱，投

进设于学校的筹赈箱，参加卖（纸）花募捐和歌咏宣传活动。吉玻各地以高年级小学生为主体的反法西斯儿童团，有阿罗斯打、双溪大年、居林、牛仑、茹嫩、美农、吉打港口、十间店、多皆、笼牙等 10 多个，小团员 100 多人。他们穿街串巷传唱民谣短歌：（闽南话）“阿哥不食（吸）烟，小妹不抹粉，寄钱回国打日本”，深入各家各户，很能激发妇女和少年的爱国抗日热情。

据《特勤工作回忆录》称，中国政府（重庆）军事委员会统计局于 1941 年举办特勤人员国外地区训练班，10 月 9 日一批毕业生由重庆乘飞机经香港搭客轮到新加坡，将总部设在新加坡，几个月后总部及名册被日宪破获，分配到吉打州的陈敬文即避进农村，没有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3 年，已有不少日本商人、医生、摄影师和行脚僧人，在吉玻各地农村游窜、偷绘地图、搜罗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英帝当局对此麻木不仁，无动于中，盲目自信防卫实力，继续压制人民抗日活动，以致急汛洪峰突临，百里崩堤，1942 年 2 月 15 日，10 万英军就在新加坡向 3 万日军无条件投降。新加坡被改名昭南岛，马来亚改名马来。

二、发动群众 全民抗日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由松井石根中将率领的日军第五师团，于黎明3时许，先后在泰国南部宋卡（Singora）和北大年（Patani）登陆；由牟田口中将率领的日军第十八师团（佗美部队）在马来亚吉兰丹州哥打巴鲁（Kota Bahru）登陆。宋卡线日军通过昔罗（Sadao），9日夜进攻吉打州北境，由武吉加由衣淡（Bukit Kayu Hitam）、漳仑（Changlun）、直插英军自己夸耀重兵固守的日德拉（Jitra）防线，驻防的印军第十一师一击即溃。12日，突破日德拉防线的日军追击南下，13日占领阿罗斯打飞机场，16日占领双溪大年，17日占领居林及万拉巴鲁（Bandar Bahru），吉打州全境沦陷。19日，日军一弹不发就占领檳城和威利斯省。10天之内，10282平方公里的吉坡两州和1036平方公里的檳威地区全部陷落，平时对殖民地人民耀武扬威气焰嚣张的英军，败退可谓神速。

长期压制马来亚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英帝统治当局，在日军风卷残云，突入霹靂州境内，大势已危时，12月18日，方才被迫释放政治犯和抗日骨干分子，承识马来亚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新加坡举办一〇一特别训练学校（101 Special Training School），马共前后选派165名党员参加受训，吉打地区丧失这个机会，短期（7—10天）受训后，分派到雪兰莪（SELANGOR）、森美兰（NEGRI SEMBILAN）、柔佛（JOHORE）人民抗日部队中，发挥骨干作用。吉打地区沦陷得太

急促，措手不及，长期与马共中央极少联系。

日军快速进攻下，英军迅速败退，吉打地区未曾发生重大激烈战役，未遇日军包抄威胁，基本整队后撤，遗弃枪械极少，人民抗日游击队建立时，武器弹药比较他州，更感匮乏。事发突然，马共吉打特委匆卒间未能对抗日斗争进行布署，抗日武装队伍的组织，缺乏整体规划，基本上由各地自发组织，力量比较分散薄弱，发展缓慢。加以华族人口仅占居民总数的 18.6%，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途径，比较其他各州更多曲折和艰难。

（一）日军的血腥统治与经济掠夺

1942 年 3 月 5 日，在日本马来军政部（8 月 1 日改为军政监部）统辖下，吉打州（包括玻璃市州）成立行政机关，知事助川静二。冈集团军鲤部队进驻吉玻各主要城镇和战略要地，在阿罗斯打、双溪大年、居林、加央 4 大区 12 个据点驻扎警备队，和雾部队驻大山脚、北海高渊的警备队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在阿罗斯打设立以东川好信为队长的宪兵队，在双溪大年设立分队。布署完成后，立即在吉玻各地进行大检证、大逮捕、大屠杀。马来亚各州几乎同时开展对华侨平民的残暴血腥杀戮，这是山下奉文统领下富部队的统一安排，“有企图阻碍日本治理政策之敌对分子，予以彻底肃清”。日军将华侨列为敌对群体，决定以大屠杀作为威慑手段，陆军

参谋本部就认为应对马来亚华侨采取“坚决的压制措施”。

日军于1942年2月15日占领新加坡，18日开始大检证大屠杀无辜华侨居民约5万人；2月13日开始，在柔佛州巴株巴辖、文律、哥打丁宜等地围捕杀害华侨11000余人；3月18日，包围滥杀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村华侨男女老幼1474人（一说当时收埋尸骸1680人，谅是包括外来、途经华人），葫芦顶各地也集体杀害千余人，全马各州无一幸免。檳城在4月5日以后，大检证大逮捕华侨5000余人，杀害2000余人，刑杀、病饿瘐死狱中千余人。每次在乡镇农村伴随着大屠杀，都是奸淫、抢掠、烧屋，野蛮暴行，遍及半岛。

3月7日，日军警备队在华玲（Baling）与高乌（Keroh）一带，开展大检证，逮捕百余人，其中部分被杀害。3月20日，在双溪大年进行“肃清”，逐户搜捕华侨“嫌疑分子”数百人，其中109人（包括妇女儿童）被运往火船头街灰窑附近集体刺死。4月6日，居林警备队将48名赌博、打架、坐自行车无灯、无执照小贩和小偷，夜间押往卓落旺巴窑，全部枪杀和刺杀，草草掩埋。张伟、蔡志强、邱进兴、彭汉强、余顺泉5个抗日同盟会的少年，于次日凌晨3时，挖出松土，逐一检查，救出受伤未殒命的两人，一是私酿白酒的华人，一是偷自行车的印度人。双溪牙兰（Sungai Lalang）小镇300多居民，夜间被日军赶往附近树胶园内，男女老幼全部枪杀。4月27日，阿罗斯打逮捕华侨青壮年103人，不经审讯杀害10几人，其他部分受酷刑致死，部分病饿死于狱中。万拉巴鲁、美农、纯笃、加央等等地区，都受检证与屠杀，日军暴行遍及吉玻两州，被捕华侨2000余人。

日本陆军训练手册规定，宪兵可以采取一切“有效”手

段，以询问战争俘虏。据此原则，日军宪兵采用一切可使受刑对象肉体痛苦难忍的严刑，其手段的残酷凶暴，更甚于德国“盖世太保”。在吉打地区施用的逼供刑法，最常使用的是灌水和殴打。将受刑者压在地上或绑紧在长凳上，将水管对准鼻咀或插进肛门灌水，等到肚子及肺部肿起，就站在身上践踏挤压，将水挤出，周而复始，部分受刑者当场死亡。殴打是拳打脚踢，或凌空摔地，或吊起用棍撞打。此外，用火烫身体敏感部分、鼻孔、指尖、乳头、生殖器；拶指、夹棍，拔指甲、拔头发；电刑和罚跪在尖锐石子或三角木头上；军犬撕咬；长期捆吊。美农抗日同盟会工作人员郑慈来（翼秋、春芝），被双溪大年宪兵队逮捕时年仅17岁，在绰号老虎的音田军曹指使下，遍受各种酷刑，灌水、毒打、钳光牙齿和指甲，拔去大部分头发，全身皮肉被军犬咬得破烂模糊，最后拒绝包蒙眼睛，昂首阔步高唱国际歌，在高呼“马来亚共产党万岁”声中被枪决。美农青年世晖被挖眼珠、刈鼻子，剥皮、泼滚水烫死。双溪大年宪兵部中酷刑而死的华侨数十人。檳城四坎店监狱所囚禁“犯人”部分来自吉打。码头工会主席李晚来，一绺银须垂至胸前，被宪兵从头上淋下汽油，自须部燃火烧死。狱长谦田（兼侦察长）和川野，严刑拷打政治犯，犯人每天每人只供2两米，或用木茨顶替，刑打致死和病饿死亡千余人。恐怖统治笼罩全马来亚。

马来军政部在推行恐怖统治政策同时，实施“以战养战”政策，竭泽而渔，疯狂进行经济掠夺。3月2日，在大检举大屠杀淫威基础上，军政部强令全马华侨交献5000万元（叻币）奉纳金，作为抵罪赎命钱（当时大米每公斤0.14元，5000万元相当于全马人民两个月中等生活费），吉打州与玻

璃市州华侨要分担 100 万元，由被迫成立的华侨协会负责征集。吉玻 4 大区的华侨协会负责人，都是各该区比较殷实的侨领，大部分是以前筹赈会的负责人，接到“赎命”奉献任务，无不惶恐万分，纷纷廉价变卖固定产业和贵重财物，到 6 月 20 日期满还无法交齐奉纳金额，再用资产抵押，向横滨正金银行借款补足。不几月，又要华侨集款奉献飞机；强迫经营进出口贸易商家缴纳巩固国防基金。日本马来军政部警务部长大谷上校坦白承认：“国政部对华侨的政策，是使他们成为一头奶牛。”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阿罗斯打设有支行，以控制吉玻地区的金融流通。东洋矿山株式会社在 6 月间就掠夺了英资的锡矿、钨矿厂场，华侨矿场也被廉价强迫收购。昭南护膜组合经济和东印度殖产株式会社即抢夺英美胶园、资产和积存树胶。千田商会等垄断集团以低价强购华侨的板厂、榨油厂和碾米厂；东京急行株式会社垄断汽车运输。日本垄断财团掠夺吉玻的胶锡、木材、碾米等重要产业，排挤华侨经济。同时，从 3 月开始，在军政部支持下，水产、菜蔬、煤炭、肉类、粮油、烟叶、百货等等十几种组合相继成立，由日本、台湾小商人和投机浪人分别包揽，统制市场，低价强购工农业产品，高价售予居民，从市场垄断中牟取暴利。日本作家明石阳至也认为，组合“只不过成为榨取公众人士的一种垄断企业。……使到高昂的生活费不断上升……互相压榨。”日本陆军当局《南方军政实施要纲》，提出“关于经济开发方面，其方针首以利用现地人力物力资源为要图，以期积极利用以增强帝国遂行战争之力量；从速确立财政之自立，以拨注军政费用，并力求将来负担国防上所必需之经费。”高强度的掠

夺，把华侨逐出商业领域，窒息华侨经济，使生产萎缩，物价飞涨，马来亚经济濒于破产边缘。吉玻两州由于因毗邻盛产粮食的泰国，本地且是产粮区，所以缺乏粮食而水肿和饿死的各族（尤其是泰米尔族）人民，比较其他各州，数量大为减少。

马来军政监部提出，统治既要把握“物”，还要把握“心”。在全马来亚各州全面实施同化教育，确定教育方针“应为增进帝国与马来间之关系，而谋获大东亚之光荣与繁荣”。使马来亚“皇化”，坚持马来亚为日本的一个属地。吉玻原有华文学校 50 多间，沦陷后全部封闭停课，1942 年底才有 6 间华文小学被批准复课。授课语文以日语为主，学生每天早晨要集体面向东方日皇宫廷遥拜致敬，唱日本国歌“君之代”，教授华文只限一课时，其他课时以华语讲授日文。马来学校 90.7% 复课，印文学校 76.9% 复课，华文学校只有 11%（1941 年，全马华文学校 1522 间，学生 137328 人，1943 年 1 月，全马华文学校只剩 185 间，学生 24078 人）。1944 年 3 月，军政监部且宣布废除华文私立学校，并禁止在公立学校中以华语教学。所有商店招牌，抹掉英文，改为日文。军政监部严禁各族人民悬挂本国国旗。一切不利于日本统治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书报和言论，均属大逆不道。一个华侨因给家属信中写上“路途不便，不能前往”，在投邮之后被查获，即被宪兵队逮捕拷打刑讯。第一任军政总监黑田重德露骨地宣布，即使誓言效忠的华侨，亦应剥夺他们在各方面活动的自由。吉玻华人能够看到的报纸主要是檳城（被改名彼南）的《彼南新闻》，吉隆坡的《兴亚日报》和新加坡（改名昭南岛）的《昭南新闻》，全属各该地日军宣传班所领导。

所有报刊极力推行愚民政策，颠倒黑白，隐瞒真象，威吓、欺骗各族人民。

（二） 人民奋起 反抗侵略

马共吉打州特委在日军南进之前，积极领导吉玻两州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已受英帝殖民当局的反复打击摧残。特委书记许瑞图被驱逐出境回归中国汕头。接任的书记老顾，1942年调离吉打，在霹雳北部被捕，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吴亮明继任书记后分工领导吉打中部地区工作，另两个特委委员陈炳宏和刘刚，分别领导北吉打和南吉打（包括威省地区）工作。在特委工作扩大会议上，选派陈炳宏为代表，到吉隆坡石山脚参加9月1日马共党军高级干部会议，由于莱特出卖，会场受日军数重包围，炳宏在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刘刚（刘汉辛）是知识分子，1942年7月由霹雳州调来，1943年初因叛徒出卖，在武吉士南茂（Bakit Selambau）被捕，在双溪大年宪兵部受叛徒当面对质，经受严刑毒打，怕昏迷中会泄漏组织秘密，用刀片自刎生殖器，被及时发现，抬往医院救治，回牢后以头撞墙牺牲。吴亮明也被捕入狱。此后，吉打地区的抗日斗争，全靠各区分散组织活动，各自为战。当时吉玻两州的马共党员约剩30多人。

1942年底，马共吉打特委的重要据点阿罗斯打米较公会，座办跛脚陈（指委委员）被捕后叛变，加上叛徒庄昌益、

许其臻相继投敌，各区少部份抗日工作人员被捕后连锁出卖，使吉打地区马共组织陷于瘫痪。许其臻甚至捏造“学生抗日案”，诬陷华侨中学学生十余人。十余学生忍受不过酷刑毒打，被迫在狱内商议作假供词，集体虚假承认是马共党员，并分担各种职务。不料宪兵乘线追查马共文件和武器，诸人无法交代，仍遭毒刑，其中4人被拷打致死，余人被判徒刑，直至日本投降后才获释。双溪大年马共区委书记谢维汉，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南渡马来亚的工人党员，1943年初在阿罗斯打南部十字港，被暗藏日本特务谭拔群（注②），带领日本警备队逮捕，押解返双溪大年途中，于疾驶的卡车上跳下公路，跌断双脚，伤重牺牲。

马来军政监部认为：“华文教师是华侨当中最反日者”。吉玻各地教师先后被捕被杀十多人。华侨中学、育才、新生、毓德等等学校，培养爱国学生的优秀园丁许逸似、梁栢材、蔡有松、柯连务等等，甚至僻壤深山的纯笃甲子山小学夫妇教师梁延业、陈凤娥（两人都是马共党员，协助张求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都是抗倭壮志未酬，血染螳军屠刀。吉打地区到处笼罩白色恐怖，日军暴行却激发起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

日军侵入马来亚以后，各地反法西斯同盟会一律改名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会，以前抗敌后援会的成员大都参加了抗盟。组织重点由城镇转向乡村小镇，分别在各该区马共支部或党员领导下开展抗日活动，彼此间没有隶属关系，但有秘密的联系。分散活动，各自为战的特点，比较其他各州突出。

1942年1月，来自檳城的马共特派员傅亚宁和马共吉打州中区负责人黄志成在牛仑会晤，鉴于吉打干部比较缺乏，檳城孤岛抗日工作的开展存在缺乏周旋余地等实际困难，由

傅亚宁到栢城调集一批干部到吉打，加强抗盟、宣传和武装抗日组织工作，包括杨国璋（老杨）、梁天文（陈亚明）、方壮志、小吴、小周（曾雪红、女）；同时从北吉打调来张石头（张牙）、董炳南（古董）、梁栋材（外号希特拉）等。张石头、董炳南、梁栋材、小周等加强抗盟组织领导。黄志成为加强各地抗盟的联系，独乘自行车（脚踏车），跑遍吉打中北部，确定下联络站点与人员。站点包括阿罗斯打、双溪大年、仁岭、美农、武吉茹嫩、双溪牙兰、班茶等等 16 处，以后续有增加；联络人员既有马共党员，也有当地侨领（郭六一等），绝大多数是以前抗援会的骨干分子。

阿罗斯打地区是日军统治吉玻两州的主要基地，军政和经济中心，抗日活动，受到大力抑制。抗盟还是秘密建立，但活动较难，牺牲较大。领导人谢维汉、董炳南、张求进（张牙）等，谢董先后被捕。属下抗日儿童团比较活跃，晚上摸进被封闭的华侨中学，偷运出钢板、腊纸、白纸，供给《活路报》使用。在十间店小河桥墩洞中，挖出英军一堆手榴弹（可能原拟用以炸桥），在足球场检拾英军败退时丢弃的子弹，佯装游玩，检拾后即交抗盟转送吉中抗日游击队。马共 1933 年老党员陈亚辉在多皆河边游泳时发现河滩有子弹，天黑时与张桂光在河中挖出两个半小麻袋子弹和 10 几颗手榴弹，黎明即由抗日儿童团团长郑开兴，用自行车载往牛仑牛场，交给黄志成，牛场刚在组织游击队。儿童团还秘密传送《活路报》、侦察火车站日军动态。1942 年底，由于许其臻出卖，儿童团负责人被捕，黄文章英勇倔强，被宪兵杀害，郑开兴长期监禁，金虎、马顺、庞业居等疏散避居外地。1945 年 7 月，抗日儿童团才恢复组织活动，团员发展到 60 多人，增加李耀

光等积极分子，重点工作是鸠收抗日同情捐，秘密传播抗日战争胜利消息。

吉中牛仑、茹嫩一带抗盟由刘荣光、黄志成、龙焕文、罗昌明等负责。威省大山脚一带抗盟由北海小学教师阿金夫妇及小胖、阿容等负责。武吉司南茂一带由钟子路、戴翔等负责，戴翔兼任别动队队长。吉南居林地区各地分别由张云、陈古、黄易生、陈海汀、卢连昌、张百川、陈鲁、胡万英等负责。拉务勿杀的60多间商店，几乎家家都交常月捐，殷实商家还交扩军费。各地抗日同盟会最初是秘密宣传抗日，侦察日本军警动向，劝募抗日同情捐；以后逐渐加强配合抗日游击队和锄奸（武工、别动）队进行侦察锄奸情报，劝募支援抗日武装斗争的粮食和医药，选送抗日武装后备队员。

阿罗斯打、双溪大年、加央、居林4大区都分别组织抗日同盟妇女活动委员会。阿罗斯打妇委会初期由伍仙爱负责，几个月后因叛徒活动猖獗而停止组织宣传工作。双溪大年妇委会由刘力（励）负责，半年后也因委员被捕而陷于停顿。居林妇委会比较活跃，由曾雪虹（曾素珍）、丫头（新加坡女工领袖，日侵前在檳城从事工人运动）、黄玉心（后在霹雳抗日工作中积劳成疾病逝）、梁良（瑞梅）、章楚英领导，1942年3月，在硕莪廊开办松鹤牌香烟厂作掩护，在华侨妇女中宣传抗日、散发地下抗日小报，发展会员，收募抗日同情捐。将近一年，受双溪大年妇委会被破坏余波的影响，获悉宪兵部暗探将来搜捕，负责人分头出走暂避。梁良和母亲熊凤桂都被逮捕刑打，家中被搜查7次，找不到可疑物证，又追查不到其弟梁树荣（陈古）去向，母女才被释放回家。

抗盟在各地的华人农村中最活跃。吉玻两州的华侨农民

(渔民)约3万多人，分散居住在水源丰富的海河附近和山林近平野农村（甘旁 Kanpong），前者多种水稻和捕鱼，后者多种杂粮、木茨、烟叶，部分兼种橡胶或椰林果园，大多数是潮汕人，闽南和客家人较少。华侨农民的家乡故土观念很重，绝大多数是爱国爱乡，仇恨日军对中国和马来亚的侵略暴行，对外来生面人保持较高的警惕性。农民抗日同盟会的干部大都是同乡人，关系都很融洽密切。农民抗盟为抗日游击队提供粮食和情报，以亲属名义掩护抗日工作人员，藏匿抗日病伤员，输送武装后备人员，是人民抗日军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持者。

吉打州在抗盟的组织下，并以抗盟名义出版秘密的抗日小报。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马共吉打州特委，已在党内出版《真理报》，作为教育党员和反帝、抗日的不定期刊物，1941年底停刊。1942年1月，以傅亚宁为中心，与黄志成、方壮志（原任《现代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共同筹划以抗日同盟会名义，编印抗日小报《活路报》。方壮志（小何）任主编，小学教师龙焕文助编，刻写钢板兼油印是茹嫩毓德小学教师林锦猷（林风），3人都是马共党员。小吴、焕文也协助刻写油印。稿源来自阿罗斯打、双溪大年、居林、加央、栢城和威省；国际和中国的时事新闻即靠一部暗藏电台，多数是收印度新德里和重庆、昆明电台，莫斯科和伦敦电台收听不清晰，少数由各地供稿。用8开的白报纸，双面印刷，油墨时蓝时黑不定，每期字数约2000—3000字，每月出版2—4期，每期约印刷1000份。3个月后，增出马来文报，主编是曾在马来文学校读书的张桂光和辛格。辛格是印度侨生。《活路报》先后在仁岭（Jemiang）、尖不拉（Chempedak）、多

皆 (Tokai)、小铅 (Yen Kechi)、大铅 (Yen) 等处胶园、农村中流动编印，1—2 期就换一次地点。傅亚宁于 4 月份由马共中央调走。

《活路报》所用腊纸、油墨、白报纸、油光纸，都是依靠各地抗日同盟会搜罗供应。发放范围很广，各大区和威省都有，一般先运尖不拉交通站，才由各地派人领取分线传发。茹嫩派出小青年许明耀及方克明，领取《活路报》，藏进自行车车把管内和皮座下管内，沿途在四叉路、十字港、笨简 (Pendang)、竹城、双溪里茂 (Sungeli Limau) 各地分发，同时了解敌我情况和鸠收同情捐，分文不留，悉数由交通站上缴抗日武装部队。劳累一天，途中仅用一分钱买杯咖啡冲水充饥。为了迷惑敌人，《活路报》有时先往南送到三巴央，然后陈鲁安排彭汉强乘坐自行车，北上 140 多公里，转送给加基武吉 (Kaki Bukit) 抗盟，再转发给玻璃市州和章仑、纯笃一带。6 月，党员邱习、张昌、带《活路报》往栢城，由于居林汉奸何兴告密，在三巴央义冢被 4 名日本警备队士兵抓获，强迫邱张两人在新民小学附近，自己挖坑，然后加以活埋。党员罗昌明、叶瑞祥、李源新等，也因涉嫌散发《活路报》而先后被捕，受到灌水、拷打，终因没有证据，被判终身监禁。

《活路报》前后出版 30 期，最后一期首条国际新闻是：“中途岛之战，美海军重创日海军”。1942 年 7 月，主编方壮志在双溪大年交通站（中医师郭六一所经营的烟厂）被捕，《活路报》就此停刊，收音机及印刷用品，由抗盟取走。

与编印《活路报》同时，居林地区由陈海汀等编印过《先锋报》，8 开油光纸单面油印，发送到几个大区，出版几期就停刊。另出版过《爱国报》，几期就结束。栢城抗日小报，

曾由小渔船带到吉打、班茶等港口。马共檳城地委机关报《公道报》，先后由杨果、黄耶鲁、陈家光等主持编辑，蔡新来、陈光华、王海志、陈荣标等刻印腊板分发，1942年5月，市委遭受严重破坏而被迫停刊。短期间出版光明报，几期就被迫停止编印。1942年4—5月间，王云在威省高渊三百卡基筹建机房，出版油印小报《抗敌报》，由杨彬编辑，次月就被日军破获。

此后，各区的抗日传单，都由抗日同盟会逢有重大事件才临时编写印刷或书写张贴散发，一般署用“抗日游击队”的名义。传单数量虽少，可是群众之间秘密流传却很广，越传越生动，越播越惊人。

1941年12月10日，马共七届二次中央执委会提出“行动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卫马”的口号，号召党员及各民族人民武装抗日、保卫新马，保卫家乡。吉打、玻璃市、檳城、威利斯省人民，从日军的残暴血腥统治和敲骨吸髓剥削中，逐渐深刻领会到，武装抗日已成出路的唯一选择。当时流传几句慷慨激昂的誓词：“家已破，人已亡，为何不抵抗？！头可断、血可流，亡国奴不可当！”

1942年初，马共檳城地委领导人亚炭，由王海志引带，往牛仑会见绰号“和尚”的马共吉打州特委成员，探讨在威省和吉南地区建立抗日游击队根据地问题，因为党组织已陷瘫痪，党员走散，群众恐慌，武器缺乏等问题，一时未能达成协议。但是失去组织联系的马共党员和热血青年，却在吉玻檳威各地，自发组织开展武装抗日活动。

马共檳城地委受破坏后，曾与吉打特委合组檳吉特委。

1942年1月，将部份骨干转移到威利斯省，分别于大山脚（Bukit Mertajam）和高渊（Nibong Tebal）地区设立联络点。大山脚有地委负责人老郭（郭适存，福建人，绰号黑面包公）、老陈（黄原，绰号高佬八字眼）、林铁（潮州人，调自新加坡），3人是特委委员。还有叶女、刘任宾（瑞平）、来自北海的阿金夫妇、燕关妙（后在爪夷被捕叛变）、阿容与来自吉打的小胖。阿容、小胖负责大山脚抗盟工作。另一路在角头上岸，刘才（刘荣光）、许如枝、陈铁、杨彬、曹自克等人，在威省南部、霹雳北部边界活动。一月后，在爪夷山深处阿老建立抗日游击队营地，联络点设在阿老小学（原校长黄树邦）。收集英军丢弃的枪械子弹，游击队员30余人，小队长陈瑞荣（上海荣）、教官陈世坚、联络员王云（郑子炯、钟子路）、指挥员林铁，特约军医曹日初、军医顾问邱君超。5—6月间，日本警备队由马来人带路，从吉打大港尾向阿老营地进攻。天微亮，海南哨兵向日军开一枪，惊醒的队员们仓促应战，且战且退，冲出敌军包围。陈瑞荣小队整队顺三巴央方向撤入吉打南部，陈世坚冲出后跌落山涧牺牲。王云等退往拉务勿刹，陈小坤等转移到加拉岸巴口一带。游击队武器很多丢失，自此多数转入各地抗日同盟会工作。在双溪谷的栢威游击队，曾经派人和亲国民党而拥有武器的小橡胶园主及华侨农民联合组成抗日后备队，成员复杂，思想混乱，三两个月后，内奸告密，郑佳等负责人及队员被日本军警围捕，武器全部丧失。

1942年2月，傅亚宁与马共牛仑区委黄志成议定，由志成和龙焕文、罗昌明、叶瑞祥、秦临健、秦临银等在王仁园橡胶园中红毛丹园开会，议定组织华侨抗日游击队，已搜集

到来福枪 5 支，子弹一批，手榴弹 50 颗。不久，栢城钟灵中学学生肖亚河及亚岳等人到牛仑找志成参加游击队。队员有刈胶工人、农民、教师、店员、学生共计 10 人。大家都没有摸过枪，凭着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共同愿望而汇集在一起，游击队在夜晚惩戒过维持会中的个别败类，用锄头消灭一个到园中侦探情况的警备队线人。亚河和亚岳手脚白嫩，不像当地的工人农民，不善于晦藏，白日到村镇走动，引起日探注目，不久就被捕牺牲。志成的胞兄黄和龙因携带武器被捕，在双溪大年宪兵部受刑时大骂暗探卢鑫昌，被杀头示众。警备队数次到附近农村、胶园一带搜捕，游击队员暂时走散，分避各地。

与此同时，老杨（杨国璋）、陈亚明在仁岭路八条石温华记锯板厂茅屋里，组成抗日游击队，队员有张桂光和来自钟灵的学生共 10 多人。亚明在新文英将 1 个掉队的英国士兵，装在大竹篓里，用自行车载到仁岭，英兵因患病无法治疗而逝世。由于老杨从武吉士南茂运载武器，途中被警探发现跟踪，游击队只好暂时遣散。

3 月下旬，黄志成、廖克业、陈应兆、庄健英、陈明杰等在离茹嫩小镇一英里的胶园里克业家中开会，一致赞成重组抗日武装队伍，4 月份就在千二廊茨园山建立抗日游击队，郑子松任队长，李田鸡、李阿参、陈广河等队员共 12 人。不料刚刚成立，有个队员在揣摩来福枪时走火，惊动驻防茹嫩的竹内警备中队，顺着枪声前来搜索，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毫无准备，仓卒间分散往东北山区撤退，短时间内无法从新集中。

4 月间，由戴翔主持，在武吉士南茂成立抗日别动队（锄

奸队)，队员有阿莫、小铁、阿拉、马遭等人，分别收集武器，准备在四百廊林连登胶园附近山上集结。两个队员夜间从双溪牙兰用自行车运载几支英军遗弃的来福枪，在四百廊仁岭路上，被马来警察拦阻住检查，展开格斗，用匕首将警察刺伤，推卧土坑中。警察次日甦醒，被居民载到医院救治，警察局即派武装警察到处搜捕，别动队转移到武吉士南茂邻近，流动驻扎于无人的田头小茅寮，分开小组活动。年底，戴翔带领小铁、阿莫到牛仑，向日探黎凉琼连开三枪，没有击中要害，凉琼自此越加猖狂。交通员吴海带小铁、方舜之转调北上，途中被凉琼认出，即带日宪兵将3人捉往双溪大年宪兵部严刑拷打，吴海（林亚海）受刑不过，供出并带领宪兵前往武吉士南茂交通站及别动队驻地，先后逮捕区抗盟负责人鲁明，又抓获王云及特委刘刚，阿莫亦被捕，戴翔即走脱。凉琼拷打阿莫时追问：“是不是你参加开枪打我？”阿莫挺胸承认：“是！后悔没有打死你！”于是遭到更惨重刑打。戴翔继即被调往吉北地区，吉打中部的抗日游击活动，自此短期停顿下来。

1942年1月，据马共栢城地委的指示，由吉打调往栢城领导油业工人运动的马共党员杨克，带领两人，将几箱从英军仓惶遗弃的仓库中拣到的手榴弹搬往威省，供应在爪夷山上组织抗日游击队栢威战士。不料在日落洞将手榴弹搬下舢舨时，被青丁（缉私员）误当走私物品抓获。杨克机警地打骂同行两同志，说是收钱受雇用，却串通青丁来抓他。使两同志摆脱干系，自己承担一切。杨克被抓到宪兵部，饱受毒刑后从容就义。

4月29日，在栢城日军宣传班指使下，一些民族败类驱

使部分群众参加庆祝天长节和占领马来亚的游行。接受抗盟的布置，青年锄奸团员饶螺珠和苏乌马，向游行队伍中日本官吏及民族败类密集的人群投掷一枚英军手榴弹，炸死炸伤十儿人，游行队伍鸡飞狗走星散。因叛徒出卖，螺珠和乌马事后被宪兵逮捕，受尽毒刑，拒不招供组织情况，最后被用倭刀杀害。

枋吉抗日人员，由朱丁（蔡天定）等组成一小队，穿戴类似日军服装，惩戒和处罚几个严重丧失民族气节的华侨“知名人士”。岛上缺乏回旋余地，在警方追缉下，几天就无声解散。当时，黄庚凤（赖纪婆）在枋城浮罗山背（Balik Pulau），不但积极支持儿子赖成就抗日活动，在大检证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下，如常乘坐自行车传递抗日情报，从山背到枋城途中被日探逮捕，搜出情报及抗日传单，受严刑拷打，只字不吐，被宪兵用刺刀刺死。

爪夷山上，曾经由一个在中国参加过大革命斗争的客籍工人朱某，组织一个抗日游击小队，进行抗日宣传，警告一些败类和日探线人。由于武器弹药太少（只有几支猎枪），没有适当的隐蔽基地，又缺乏群众基础，活动与生活都很困难，几星期后就自动解散。

5月间，近10名由枋城走避到威省的钟灵中学学生，在当地旧同学帮助下，搜集几支英制来福枪和私人猎枪，借着迷朦月光，进攻四叉港（Simpang Empat）警察局，马来警察都带枪从屋后逃跑掉，结果劳而无功，未能收缴到武器弹药。游击队伍当即转向当铺钱庄，将劳苦人民的借据全部烧掉。几天后，在红毛巴进攻一个为虎作伥的枋城邮政局长黄某的住宅，黄开枪回击。那时附近常有盗匪出没，引起村中自警团

误会，鸣锣聚众，平装的游击队怕误伤群众，只好撤走。这支游击队不久在日本警备队追逼下，自动分散隐蔽，成员分别奔赴吉打，霹雳各地。

1942年底，阿初、阿冰、阿竹、阿带等11人，在威省靠近霹雳的万拉巴鲁（Bandar Baharu）和双溪巴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受到高渊日本警备队追捕，转移到吉打拉务勿刹，当地抗盟指定陈海汀杂货店与阿初单线联系，并供给粮食和生活必需品。11人都住在胶林里简陋茅棚中。1943年初，日本警备队在拉务勿刹进行大搜捕，搜到所居胶林时，游击队员突围撤走，一个队员当时被击中牺牲，6人脱险，阿初、阿冰、阿竹、阿带被捕。阿冰坚定刚强，宁死不招，受灌水酷刑时，宪兵站在阿冰腹上蹦跳蹂躏，即时牺牲。阿带和阿竹当了叛徒，供出抗日活动详细情况，指证阿初是马共党员。阿初受尽毒打，坚决不肯吐露组织秘密和领取生活用品的供应站点，但因阿带和阿竹当面对质，只好承认马共党员身份，被带上“共产党”臂章。拉务勿刹部分群众被捕，包括陈海汀在内。在拘留所内，阿初窥隙暗告海汀被捕经过，嘱咐海汀切勿暴露身份。海汀方知不是被出卖，虽受刑打，因无罪证，不久被释放。阿初即被绑赴刑场，英勇成仁。

当时有少数黑社会和流氓份子，趁机组织强盗小团伙，对各族人民进行勒索、诈骗或公然抢劫，威省南区和吉玻北部，都有小股匪徒假冒“华侨抗日军”。威南小股在日本警备队围剿下四散消失。1942年7月，三巴央丘天福8人抢劫团伙，抢劫抗日重点联络站，联系梹城、威省、吉打（居林、司南马）的大港尾一间杂货店，天福将老同学“店主”蔡烽火（蔡传琪）胸部刺至重伤。后来匪帮内讧，惯匪何兴负伤投敌，

带领警备队逮捕丘等7人加以活埋。何兴杀害抗日人员多人，后被抗日别动队处决。吉玻北部在人民抗日军追击下，小股匪徒逃往泰南勿洞一带，8年后才被人民解放军消灭。

武装抗击日本侵略军，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栢吉大批热血青年不顾力弱勢险，不怕抛头颅洒热血，分别自发开展游击战争，结果大部份失败或无法坚持，主要原因一是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二是缺乏坚强有力的核心骨干；三是缺乏组织严密的群众支持。吉玻两州发展抗日武装斗争还有一个客观困难因素：抗日意志比较坚定强烈的华侨人口只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强。初期，日军的欺骗谎言，对马来和印度民族的大部分人，产生过蒙蔽麻痹作用。对印度人民说是要驱赶英国统治者出印度大陆，帮助争取印度的独立解放。对马来人民说是驱赶英国殖民统治者出马来亚，以解放被奴役剥削的马来民族。一段时间以后，看到日军到处烧杀抢掠，甚至强奸马来妇女，褻渎回教教堂，组合会社压价强购马来人民的稻谷农产品和渔牧产品，马来人只能在政府机关担任副科级以下的低级公务员，苏丹与拉惹成为不敢吭声的傀儡；尤其是1943年10月18日，日本根据战时首相东条英机于7月间在曼谷和泰国国务院长銓披汶议定的“共荣”大计，宣布将玻璃市、吉打、吉兰丹（KLANTAN）和丁加奴（TRENGGANU）划归北马马来人民祖辈宿敌泰国以后，广大马来人民方才逐渐看清日军的侵略实质，对抗日武装的态度，部份相应转为潜默同情（注③）。

三、人民武装 发展壮大

吉玻两州华侨青年，受到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和《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经典理论的启迪和鼓舞，对开展游击战争以抗击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充满信心，满怀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憧憬，面对数量与配备、训练占居绝对优势的敌人毫不畏缩，坚持苦斗。吉打东部和北部的人民抗日部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善于运用主动、灵活、避实击虚，迂回机动的战术，密切联系群众，在困难中力求发展，在战斗中锻炼壮大，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终于在各州兄弟抗日部队的配合下，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好形势中，迎来最后胜利，并改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

（一）吉打东部人民抗日部队

日军侵马以前，马共居林区委委员张云（张土、亚汉），是吉打南部树胶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组织工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1942年1月，张云、张田（号称神枪手，在中国参加东江土地革命），在刈胶工人中组织抗日游击小组。日本警备队和武装警察前后4次到三巴央胶园和荒野丛林中搜捕张云。同月，威省爪夷一排马来武装特警到三巴央胶园围捕游

击小组，游击小组开枪还击，众寡悬殊，火力太弱，组员何亚泉在驳火中中弹牺牲，其他人带上猎枪暂时走散，事后才又聚合。

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三），北海（Butter Worth）日本警备队分乘3辆大卡车，加上特警30多人，从大港尾、爪夷、三巴央三面合进，迅速包围半路店（Ayer Puteh）树胶园，张云走避不及，和其他60多个刈胶工人一齐被捕。日军中无人认识张云，使张云得以混身被捕工人之中，在三车警备队监视下徒步走向北海。押解途经灌木野草茂盛的山崖处，早已机智逃身没有被捕的张田，隐身另一侧高处树后向日军开了一响冷枪。日军顿时慌乱起来，往山林处还击，张云乘机跳下山崖逃跑，天色将黑，日军不明地势和敌情，不敢追捕，只是乱开几十枪就继续上路。其他工人在宪兵部遭受毒打逼供，日宪毫无所获，10天后才被释放。

几个月后，张云、陈忠等人，在威省南部阿老山抗盟协助下，收集10几支猎枪、来福枪，再建抗日游击队，由陈忠主持军事训练。操练公开进行，保密不好，风声外传。不到一个月，就受日本警备队进攻，在防御战中死伤数人，其他人撤走。武器大部分丢失，只带走一支捷克制手提机关枪和一支来福枪，暂时埋藏在“五公司”胶林山上。陈忠只身走往吉打北部。

张云祖籍广东拈西，早期马共党员，刈胶工人出身，机警勇敢、爽朗、坚定。在吉南数次被追捕，无法继续在三巴央地区活动，转移到阿罗斯打甲抛拉巴底（Kapada Batas）日本空军机场邻近，以菜农身份掩护，设立交通站。李坚、刘荣光批评他吃了豹子胆，以后才和张田一齐转移到吉中地区，

住在侄儿张世进家，表面是当种木茨蔬菜农民，暗中积极筹备组织武装抗日活动。当地抗盟帮他找到两支英军来福枪，张云锯掉木枪托，会同张田几人，大白天在美农大街上击毙一名民愤很大的宪兵部华人暗探，缴获一把手枪，丢下手写的锄奸通告，署名是“抗日游击队”。

不久，当张云在武吉士南茂活动时，被两个似曾见过面的马来武装特警抓住，叫张云走在中间，在从捷径小路押往双溪大年途中，经过一座独木桥，恰巧遇到牛仑牛场新成立抗日游击队队员林坤山（阿振）迎面走来，坤山与张云并不相识，但从受武装警察夹在中间的硬朗汉子，雄纠纠气昂昂的眉目间，领会到不是刑事犯人，九成是抗日志士。于是退避桥头一旁，等到3人刚过桥，就将担在肩头的锄头，往跟后警察的脑袋抡扫过去，将他打下河中；张云一时警悟，也将走在前头的警察拦腰抱起，摔落河里，张林两人略打招呼，就匆匆分开走散。

1942年底在张云领导下，由张田（张习）、温祥等在华玲东部山区成立抗日游击小组，进行锄奸活动，消灭两个暗探，途中伏击一辆日军汽车，击毙一个日军和一个马来武装特警。因受华玲警备队追击，方才撤返吉打中部牛仑一带活动。温祥于6月间，独自突击马来仔小警所，两个马来警察被赶进卧室，温祥缴获20发子弹、两支来福枪，连夜带回爪夷胶园，锯断木枪托以便于携带。在当地抗盟武工队员配合下，消灭流窜于南区的暗探蔡笑、钟兴，还击毙一个居林警备队哨兵。

马共中央于1942年5月，在柔北三合港召开中南马高级干部会议，已经秘密向新加坡日本宪兵队大西觉少佐投诚的叛徒莱特，提出“保存力量，积累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反

攻”的方针，严厉批判向日军开展武装战斗，是暴露目标，吓跑群众的冒险行动。不久，一个马共中央特派员黄亚水到吉打北部召集各地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在漳仑会议上，传达莱特别有用心的右倾言论，反对武装斗争，结果受到抗日游击队领导人的严肃批判。亚水灰溜溜南逃，骗得不明情况的拉务勿刹民运人员吴影（吴月娥，春梅的母亲）的信任，带他到麻坑（Mahang）逃往霹雳，数月后向太平宪兵部投诚。

1943年初，老杨在阿罗斯打被叛徒杨清出卖，为警备队逮捕，后被假释作钓饵，老杨乔装摆脱跟踪，躲上南下火车硬座行李架上装病人，混过警备队追查，走进牛仑三千廊聚合。张云连同刘荣光、老杨、张田等，将28个游击队员整顿改编，正式命名为“吉打抗日游击队”。张云要照顾吉中吉南各地抗日同盟会的组织活动，需要到处走动，不在队中任职。由刘荣光任党代表，兼领导吉中地区抗盟工作。老杨任队长，他善于宣传鼓动。只有刘荣光公开马共党员身份，其他张云、老杨、张田、温亚月、温祥（长脚）、方克明（黄木桂）都不公开党员身份。党群之间和队员之间关系亲密，感情融洽，亲如兄弟，有好食品互相推让，队员嬉称队长为“短尾”（杨羊同音）。克明当文化教员，教唱抗日歌曲；荣光编写抗日短剧给大家排演，生活相当活跃。武器只有两支勃朗宁手枪（亚才、张田各一支），10支来福枪和1支英制手提机关枪。初期，民运工作未组织好，群众不大敢接近游击队，粮食供应有困难，游击队只好买南瓜，挖野菜三统和，摘鲁芒心，采野木瓜、野榴莲、野香蕉等当饭吃。不久，民运工作逐渐加强，军民消除隔阂，开起群众大会已有40—60人参加，群众捐赠大米、番茨、木茨随之增多，游击队的饮食才缓缓改善。

经过派人实地调查，了解爪夷特警经常外出，留驻警局人数不多。由张云、张田带队，温祥、温亚月、林坤山、林春奇（亚东）、林坤（海南坤）等十多名游击队员，分组由小路跋涉两天，到达爪夷，于夜深人静时，向警察局发动突然袭击。所带武器不多，部分人是带手榴弹、短刀、铁尺，从睡梦中惊醒的警察，从警察局往外乱开几枪，就带枪支从局后影暗处跑掉，游击队只缴获3支来福枪。这次进攻警察局的主要目的，在于做诚肆无忌恫欺压老百姓的威省警察暗探和日本爪牙，制造声势，扩大政治影响。日军料想不到是来自近百公里外的游击队。

游击队认为妨碍人民抗日活动的最危险敌人，不是日军和马来特警，而是为虎作伥，经常在农村和集镇游荡的便衣暗探和线人。锄奸工作被列为首要战斗任务。在牛仑附近消灭两个猖狂破坏抗日活动、欺凌群众，民愤较大的警备队暗探，留下处决书宣布罪状，起了很好的威慑作用，暗探和线人自此不敢单身深入农村和胶林茨园，同情抗日的群众，增加了安全感，抗盟组织活动有所加强。几个锄奸组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远及百公里外的居林和华玲。

影响比较深远，震动范围比较宽广的是在美农深入集镇重地，虎口拔牙，消灭暗探组长李亚狗的事件。李亚狗不仅疯狂滥捕同情抗日的群众，而且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强占良家姑娘为媳妇，压价收购或威胁强购农民的生猪，供给自己所开3摊猪肉档宰卖。谁人抗卖，亚狗就指使爪牙以莫须有罪名逮捕抗卖者年青亲属，扣上抗日分子帽子，等其家人将猪奉送上门，才假惺惺通知警局放人。牛仑美农一带群众，无不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游击队为民除害。张云主持队员大

会，决定拔掉这枚毒刺。经过自动报名，组织择定，派出关伯、林坤、温亚月、胡须、林坤山、陈亚锡6人组成行动小组。每人配给手枪一支，手榴弹两颗、自行车一辆，另发100元钞票，此行危险大，难度高，预防被冲散时作交通生活费用。次日，坤山先到美农查看亚狗的住宅和周围环境通道，向一个老伯详细打听阿狗的行动习惯、时间、地点，老伯心有所悟，热情介绍后迅速走开。第3天，6人分乘自行车到双溪牙兰胶园隐蔽过夜。

翌晨，6人扮成农民，菠萝状手榴弹各藏车后菜篮里面，上盖蔬菜杂物，赶到美农大街上，在亚狗等暗探每天必来打麻将的咖啡店门口旁边停车等候。不一会，亚狗等4人乘坐高低音喇叭的敞篷小汽车到达店门前停车。不料行动组的一辆自行车勾碰倒地，菜篮中的手榴弹滚出地上，亚狗睹状立即拔出手枪。同一刹那，关伯眼明手快，抢先开枪击中亚狗握枪的手臂，亚狗手枪跌落车上，立即跳下汽车，逃向用木栅防护的自己家中，坤山紧追不舍，跨过马路，追进阿狗家中，从后开枪击中阿狗后脑，立即倒毙地上。坐于车上后座的狗仔虽掏出手枪，却吓得手足失措，瞪大眼睛，让海南坤击毙。其他两个暗探跳车逃散。匆忙间，准备好的传单竟没有散发。旁边不远的警察局狂吹警笛，却紧闭大门没有人敢出来。行动组员各乘自行车将离开时，胡须的自行车链意外脱牙，坤山将自行车和胡须对换，让他们先走，自己将车链安装好才不快不慢地随后跟上去。自行车在停在街口的日本军车旁边走过，军车上的日军给行动组员的勇敢镇定，从容不迫弄糊涂了，以为是自家的暗探，张大眼睛不开枪。街口岔路不远就是日军警备队的营房。传单虽然没有散发，可是

群众间的渲染传播，很快就吹遍南北东西。附近的居民群众高兴得不得了，游击队在几天内就收到交通站转来的大量慰问品，包括鸡鸭生猪和 3000 多斤木茨，香茨和大米。在经济生活日益困难的岁月里，这是很重份量的礼品和心意。

抗日游击队驻扎在八条石的森林中，自己搭建简陋的茅棚，用粗糙连枝的树干做柱子，芭答叶铺盖棚顶，从棚檐前斜垂到棚后地上，前面和左右通风，棚内一列通铺矮架子，用破裂的竹子做铺面，实际上类似田头看守农作物的长形更棚。由于吉中各地村镇数次白天枪杀日本暗探，所以没有成群结队，警探一般不敢深入荒山丛林。出乎意外，7 月间被一个找白藤的马来人发现游击队营所，为防止万一，当晚只好转移到九条石胶林中一间废弃的茅寮中住宿，老杨荣光往吉北新路联系工作。年底，一个不能熬受艰苦生活的游击队员，趁着张云到居林各地检查抗日同盟工作，将各地送来的 2000 多元同情捐偷走，不拿武器摸黑逃跑。隔几天，一个战士放哨时，又不慎步枪失火。张云回队后，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将队伍转移到吉东高乌山区。

队伍晚上起行，由比较熟悉那带山路的张田和温亚月白天先走，于转弯处在树干上削下树皮为记号，20 几人晚上随后，以免引起马来村民注意。不料沿途山峦重叠，原始森林苍郁茂密，山路难行，带路人竟迷了路，兜了 7 天还没有走出锡克（Sik）大山。所带干粮 3 天就吃完了，只好靠野生植物和打山猪、猎猴子充肚，有时砍马来农民的甘蔗、木瓜等农作物果腹，将纸币绑在木瓜树上或甘蔗杆上作抵偿。有时派出通晓马来话的队员装扮收购烟叶等农产品的商人，向马来村民问路并买些大米煮粥充饥。

第9天到达高乌北部山区，立即派人到镇上了解情况，无意中碰到在牛仑打过照面的暗探。次日，大队日军就进山围捕。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在敌人刚进山咀，就主动往西北山区撤退，沿着山林小径和溪涧乱石跋涉一整天，才到日落湾（Jilowang），在距离种植黄烟、花生的潮汕华人农村邻近山中停留下来。此地原有抗盟组织，农民抗日爱国思想比较浓厚。

由华玲（Baling）北上20公里的牛车路和马来农村丹戎巴里（Kanpong Tanjong Pari）离此不远。通过日落湾抗盟，稳步扩展抗日宣传与民运工作。根据群众的反映，将一个经常在日落湾调嬉侮辱马来妇女的华人暗探和一个多次诬害勒索群众的马来暗探分别捕捉押上山林中处决。又据交通员的汇报，在万那（Bana）村外消灭一个到处流窜侦察的马来线人。游击队还派出别动组到华玲铲除两个民愤较大的华侨败类。以后，在华玲北部远郊的华人与马来人农村中开展抗日宣传就比较顺利，群众逐渐消除害怕心理，农会主席陈树荣和新近调来的庄健英（小秋）、陈海汀等抗盟负责人，已能公开地向华人和马来人进行抗日宣传和收取抗日同情捐。1944年初，牛英村（Kanpong Weng）抗日歌咏和短剧演出，华巫（马来）观众已有百余人。

1944年1月23日（农历癸未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落湾村华人家家户户即将过年，群众非常热情招待游击队员们，包括张水龙、叶兴、张伟、阿锦、张立、温小山等等战士，恰逢倾盆大雨，极力挽留战士们在家用饭，不让冒雨回归山林营地。谁知一对过路的外村马来村长夫妇，进村避雨，发现了游击队员们。村长的儿子是华玲警备队的暗探，游击队估

计日军会来搜山，立即赶往营地做好应战准备，次日一早就转移到北部大山回避。

26日，华玲日本警备队加上居林等地增援部队共500多人，天明以前就进入日落湾山区，游击队得到华玲抗盟转达马来警察局长的通知，派出林春奇和林坤山出外侦察，未到农村就在山腰遭遇日军先头尖兵15人。春奇手执英制手提机关枪，坤山手执驳壳枪，他们伏在灌木林间遮掩隐蔽的土疙瘩后面，居高临下，等候日军搜索前进到相距70多米的旷地，首先开火。日军马上伏地还击，两人各扫两梭子弹，入侵者死伤7人，朦胧中不知游击队实力，不敢前进，只是盲目向上射击，等待主力部队。坤山脑后被子弹擦伤，两人立即俯伏后撤，赶回部队汇报。考虑到敌人人数多出十几倍，不宜硬碰，暂时继续往北撤退，派人观察形势变化。日军有点胆虚，不敢分兵抄击，冒险推进，停驻小山丘上，用迫击炮向密林深处游击队已经遗弃的空营地轰击两小时，放火焚烧村中农民房屋。由于日军匆促全部撤走，农民迅速全力救火，结果全部被烧的只有5间房屋。日军抓走村干部阿元，抬走伤员和死尸，垂头丧气退回华玲，按惯例在报上吹嘘显赫战功。日军进村时，庄健英患伤寒病，正在发高烧，不能走动，陈树荣将她背到山边，藏于高密的茅草丛中，陈的妻子铺几张大芭蕉叶让庄当席子，幸未被日军发现。

事后，得知是几个经常在附近马来农村活动的暗探串同告密，于是加强锄奸活动。关伯、林春奇、坤山下山，直奔华玲郊区，捕捉带领日军搜山的温六狗，六狗丧心病狂，对参加抗日活动的胞兄、堂妹也不留情，被押回山林，审问清楚而后处决。接着又派出别动队，披星戴月赶往华玲东北部

20多公里，靠近霹雳和泰国边境的几个马来农村，先后消灭了血债累累的警备队暗探张奇光兄弟和两个不听警告的马来线人，教育警告后释放了3个坦白认罪表示悔改的线人。

有个伪装零售衣物小贩的马来女暗探，到日落湾侦察几天没有回家的丈夫（也是暗探，已被消灭）行踪，被别动队认出抓获，供出华玲警备队里几个华巫暗探及其住址。别动队按图索骥，消灭其中两个，另一个被溜掉。

从此以后，警备队的暗探和线人极少到日落湾一带活动。日军耳目失灵，几个月内再没有进入山区骚扰。农村的抗日活动随着活跃起来，先后在日落湾牛英一带农村中，成立抗日自卫队、妇女服务队、粮食运输队，初步形成生气盎然的游击区。妇女服务队帮助下山活动的游击战士缝补洗涤衣服，修好被日军破坏的木臼，好让各家将捐送的谷子，稍有空闲就舂成白米，由运输队运往机房（最邻近部队营地的机密交通站）。交由战士每人背一袋，重20至40市斤不等，背负6公里左右，跋涉山涧溪流和不见人迹山地，运上营房。跟后武装人员，手执带叶树枝，扫平沙地上足迹，将灌木枝梢移放走过长满青草的“路”上。自卫队巡逻放哨，监视生面人，搜集敌特情报，由游击队派老战士在林中旷地教导军事操练，讲解作战常识。每逢锄奸成功或收得国际反法西斯战争重大胜利消息，村里都开庆祝大会，民运人员唱歌演戏助兴。村中群众工作，全部由抗日同盟会进行组织安排。

9月，张云亲自到居林布置铲除已经出卖几个抗日志士的叛徒暗探黄巡。18日，由年轻的陈春梅在大街上小食馆接近黄巡，同桌而坐闲谈几句，让馆外的别动队员认清对象。接着借口外出，行经蹲在戏院门口的张田、温祥、温亚月等3人

身边，低声说句：“3条都是狗”，意指同桌3人都是暗探。张田3人却没有听清楚。张田、温祥站起身走进食馆，猛然拔出手枪向黄巡射击，同桌的两个暗探立即向外逃窜。在馆外看风的温亚月嘍咀吹起口哨，戏院附近暗探以为大批游击队来袭，惊慌起来，全部跑进附近的警察局，关起大门，只求自保。黄巡受了重伤，但未击中要害，第二天才绝气。临死之前，向警备队告发一批“可疑分子”。陈春梅、黄凤英、吴亚欢、张致钦等人遂被警备队逮捕，遭受吊打、灌水反复毒刑后，又转押双溪大年日本宪兵部严刑拷打逼供，前后施刑6次。春梅宁死不认，坚持不屈。关押40天后，几个人才被释放。春梅归返拉务勿刹，张云马上介绍她避往吉北新路小镇，由张英才带路转纯笃。锄掉黄巡，群众拍手称快，经由交通站转递赠送不少鸡鸭猪肉慰问品。

抗日游击队还派出别动队到吉中吉南各地锄奸和惩诫民族败类。张田带领别动队，到三巴央追踪数次陷害群众的暗牌溪，跟到阿叶甫底，暗牌溪被摆脱了，只消灭暗牌溪狼狈为奸的妻舅钟观祥，对吉南和威省的日本爪牙，起了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

11月，张田、温祥、温亚月到双溪大年二街27号，准备收拾掉称为宪兵部第二号暗牌“台湾锁”，等候3个晚上，始终不见踪影。据领导决定改变目标，转到美农镇消灭称为第三号暗探林阿厚。在阿厚住家门前等了一小时，亚厚才开车停在其父所开隆茂肉店门口。3人上前去，从身后喊一声：“林阿厚！”阿厚回头观望，证明对象没错，枪声一响，阿厚跑到楼梯口仆下，还想爬上楼梯，张田追上补开两枪，才将阿厚击毙。张等随后到茹嫩枪毙警备队暗探阿迷，在拉务勿

利击毙暗探钟济南和阿述。每次锄奸都是由当地抗盟提供准确情报，锄奸之后照例留下公布罪状的传单。

吉打东部抗日游击队进驻日落湾大山时，已经和霹雳州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取得联系，开始升挂三星红旗（左边上角三颗五角黄星代表马华印三大民族），统一人民抗日军的军歌《红旗歌》（原西班牙反法西斯战歌）、军礼（右手握拳置右额边）和军纪。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军纪是四条纪律、十项注意。四条纪律是：一、绝对服从指挥；二、严守军事秘密；三、没收敌产归公；四、爱护群众利益。十项注意是：一、态度要和蔼；二、买卖要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内务要整洁；六、肮脏要打扫；七、不打骂俘虏；八、不调戏妇女；九、大便上厕所；十、洗澡避女人。

抗日游击队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和对群众的政治宣传，已是以马来亚共产党七届三次执委会通过的《抗日九大纲领》为主要内容之一。《抗日九大纲领》是：一、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二、建立由各民族普选的国家机构，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改善民生，振兴工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新马来亚；三、开放人民言论、组织、信仰的自由，取消旧制度奴役人民的法令，释放政治犯及抗日俘虏；四、改善民生，救济失业难民，普遍加饷加薪，取消苛捐杂税、高利贷；五、改编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防军，保卫国土，优待抗日士兵，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救济残废伤兵；六、以各民族语言实行普遍免费教育，发展民族文化；七、没收德意日法西斯及其走狗的财产为国有，发还被日军没收的人民及友邦人民的财产；八、实行关税自主，

建立和友邦友好条约与商务关系，承认友邦贸易自由；九、联合苏联、中国，拥护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独立，赞助日本人民反法西斯斗争。

政治思想工作的加强，学习和宣传《抗日九大纲领》，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形势，学习《论持久战》，统一军纪，增强军训，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素质和抗日斗争的自觉性，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凝聚力。

在华玲警备队进攻日落湾山区以后，部队迁徙到甘光牙笼（Kompong Galang）附近的山林里，战士已经发展到60多人（后备队、自卫队员百余人），女队员只有李群、陶小梅、庄健英等政治工作人员和吴亚花（亚欢）、蔡芳妹两位卫生员。部分战士只有猎枪，搞医护、炊事、后勤的几个只有刀斧。

1943年3月，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德军惨败，开始了法西斯阵线的滑坡，9月8日，意大利法西斯投降；年初苏罗门群岛海战重创日本海军，续后南云舰队被歼灭，美国空军连续轰炸日本东京各地；1944年6月，联军在法国诺曼第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德军在东线连续受到重创，败势已定；美军攻占关岛，马来亚日军已成瓮中之鳖，东南亚联军反攻马来亚的条件已经成熟，马来亚人民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已经结束，抗日军开始小规模进击行动。

在此有利形势下，吉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迅速发展扩大，积极准备配合联军反攻，消灭马来军区日军。各阶层热血青年，包括城镇家境小康的知识青年，不少人通过地下秘密渠道，由抗盟介绍，各区交通站接送，参加到武装部队。更多的新队员，是从民运人员、自卫队、后备队员中选拔吸收上队。以后先后成为部队骨干的邱进兴（志胜）、张立、张水龙、锦胜、

叶兴、张伟、蔡亚志、温小山、蔡华、蔡育生（全盛）、练亚发等等数十人，陆续调上部队。时常在城镇活动的别动队和民运队伍，也相应扩大组织和活动范围。陶小梅等体弱战士，考虑难以适应即将到临的严峻猛烈战斗生活，调离部队，加强民运领导班子。陈亚辉、詹德（亚西）、建文、钟保等等，也都分头调动，以增强群众宣传、部队供应、侦察敌情和培训后备队员的工作。

日军警备队对吉东抗日部队的活动，已是视闻不灵，加以能征惯战士兵多已调往新几内亚一带作战，补充新兵，不少朝鲜、台湾应征青年，士气明显低落，一般下级军官和士兵，看到德国法西斯招架无力，日军制海制空权基本丧失，已是较多思考自己的安全和命运。1944年秋后，华玲警备队奉命对北部山区进行扫荡，只是形式上“行军操练”而已，只到达日落湾山边“搜索”，不敢深入山林，兜兜圈子，乱轰一阵就往南撤退，回华玲交差。

1945年2月，吉打北部人民抗日游击队发动新路反击战，重创日军以后，张云、陈古、陈鲁3人，组成马共吉打特别支部，陈鲁任书记，议决将吉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吉北人民抗日游击队统一改名“吉打人民抗日军”。吉北部队由陈古、戴翔、陈忠等负责；吉东部队由陈鲁、老杨、刘荣光等负责。陈古兼领导吉北（包括玻璃市州）的抗盟工作，陈鲁兼领导吉东和吉中的抗盟工作，张云领导吉南和吉中别动队、抗盟及统一战线工作。吉玻两州的抗日斗争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3月，陈鲁、老杨、卫忠、国联等人，由吉北纯笃大港尾，经过巴冬德拉（Padang Terap），锡克两县山林小路，走到华

玲北面甘光牙笼山林中的部队营地。陈鲁抵达后，就将吉东部队进行改组改编，陈鲁任党代表，老杨任队长，刘荣光任副队长，张田任参谋，卫忠任政治指导员，温亚月任军需，国联任教练，温祥、陈斌、阿东、阿南、阿庆等等骨干分子，分别担任特别小队和战斗小队的小队长职务。

6月下旬，由于武器装备已较充裕，在张云领导下，由李坚、郑小雨（天贵）主持，在双溪大年知甘巴都林木秋橡胶园内，召开抗日积极分子会议，宣布成立人民抗日军特殊任务工作队，队员20多人，主要骨干来自原抗日同盟会，有陈大牛（顺福）、刘来发、黄仁、周吉等等。主要任务是锄奸、募捐、搜集和传递情报。队部设在双溪大年老卜间鸿发橡胶园内。

于牛仑牛场，在张云、张田直接率领下，成立一个抗日军分队，有彭汉强、阿卫等等30多人。黄仁任交通员，在工作队、分队和吉东华玲部队之间穿梭联系。各地抗盟积极发展抗日自卫队、后备队，根据各地暗藏无线电收音机所收到的消息，1945年2月，菲律宾已经光复，德法西斯于5月8日投降，战士们预感到对日本侵略军发动战略反攻的时刻已是屈指可数，即将来临了。

陈鲁（陈立发、阿枝），广东省普宁人，父亲在拉务勿刹开小药材店。陈鲁在华侨小学毕业后，16岁就在三巴央新民小学任教员，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不久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42年5月为避日本军警缉捕走避威省各地，并在拉务勿刹和陈海汀、卢连昌等筹组抗盟会。1944年在威省和吉中地区参加抗盟领导工作，后由张云介绍往吉北参加抗日游击队领导小组。调到吉东部队后，进一步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政

治学习制度化，并组织部分骨干分子上党课，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对全体战士定期讲解《论持久战》精神、游击战基本战术及马来亚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每天黎明5时半，山雾迷蒙，寒气袭人，哨声就吹响，在互喊“同志们早安”声中，战士们跃身跳下竹搭茅棚通铺，赶赴岭顶略大于篮球场的操场；集队点名，举行升旗礼，面对三星红旗唱《红旗歌》，分配当天任务后才散队。队里由陈斌等人编辑出版墙报，生活虽艰苦，斗志却昂扬，战士赋诗当歌，其中一首：

“叱咤风云烈，挥拳天柱折。磨刀削峻峰，待饮倭奴血。”

（二）吉打北部人民抗日部队

吉打州北部边境武吉加由衣淡和玻璃市州北疆巴冬勿刹（Padang Besar），历来是吉玻两州和泰国宋卡府昔罗县（Sadao）等地商业、旅客来往的交通要道。此外，邻近地区的泰马边境多处山口也是几百年来民间商贩交往的偏僻途径。纯笃是个邻近此类山路的小镇，南面10公里外的假子山和大港尾，即是生产钨砂和锡砂的矿区。

1942年10月10日，原合艾王振武锡矿公司的经理陈介铁，会同陈忠、西风（陈练峰）、国联（曾焕）、卢能（黄安）、卢继昌（江湖）、陈任之、韦福、梁友等等，加上妇女组赖唐妹、钟财妹、李英等合计21人，在纯笃吗叻港清水河

(Ayer Puteh) 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抗日游击队。仅有 3 条来福枪，另有一支半截的来福枪（是介铁说服当地土匪小组收购来的），被称为“三支半部队”。游击队在当地开展抗日宣传，警告一些与侵略者有来往的商人和担任当局政府、警察部门工作者的家属。游击队的经费，是在马境收购钨砂、锡砂，绕过日本矿产株式会社的垄断检查，由山路运往泰境昔罗县双溪也拉（Sungai Yala）出售，赚取收售差价。因钟常和吴昌喜出卖，11 月，受到来自漳仑的日本警备队的进攻，哨兵黄秀临危不惧，向进犯的日军开枪射击，用以警告其他队员，受密集枪火还击，当场牺牲。何东等 3 人被捕，其他游击队员走散，部份回归假子山工作。事后，少数骨干人员虽又集合，但对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方向和部队组织规划缺乏共识，抗日活动基本停顿。

1943 年初，先是刘荣光前来纯笃，找到介铁讨论重新组建抗日游击队的问题，续后李坚（李析贵）、陈古、刘强华等人着手重建工作，将游击队人员召集起来，加以整编，严明纪律，加强组织约束。梁友等 7 人不惯严明纪律的组织生活，申请退队。介铁也离队回归泰南。刘强华分工动员纯笃森林和板厂的工人参加抗日工作。戴翔动员加基武吉的青年爱国矿工，参加重建的游击队。戴翔调离吉中后，在吉北和玻璃市与赖金锋负责过抗盟工作，李坚原是负责纯笃、假子山一带的抗盟工作，都有群众关系基础，所以比较顺利地使抗日游击队与各地抗盟组织建立密切联系，逐步建立抗日民运组织，在华人（主要是矿工、森工、农民及乡镇居民）与少数马来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劝募抗日同情捐。

陈古原名梁树荣（黄落、黄能），原籍广东省台山县，1921

年出生于居林，家境贫困，小学毕业后就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经常在报刊发表抗日救国文章，1942年初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宪兵部数次追捕他，1943年春，马共吉南组织调他到纯笃地区工作。他在假子山与矿工同食、同住，在爱国热情较高、抗日意志比较坚定的青年矿工中，培养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包括卫忠（胡棠）、奋光（罗潭发）、白杨、陆万华、黄开洪、绍平（龚华）、文山（罗潭华）、志业（梁明）、江湖、英才、毛强、启州、明瑞、志勉、志明、管生、贺苟、袁康、巫阿友、朱振兴，还有中医师赖守廷等等，他们在以后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积极的骨干作用。

1943年5月，假子山日本东洋矿山株式会社总经理寺户太郎，对工人的压制日益加剧，不仅压低工资，又不许工人在矿区以外地区淘洗出售矿砂，工人生活非常困难，无不切齿痛恨。游击队决定加以铲除，既平民愤，又为开展抗盟活动清除绊脚石。于是派出卫忠、奋光、强华、毛强等5人，晚上9时摸进太郎住宅，冲进卧室，太郎来不及拔出手枪就被短刀刺死，别动队缴获曲尺和双管猎枪各一支，子弹28发，然后撤退。提着木棍值夜的自警团员早得暗示，跑到远处巡逻，当作不闻不见。百来米远的7个马来警察，关起门来，自保平安。矿业株式会社早已困于工人的怠工，无利可图，经此事变，就停业关门。本来，南侵之前，日本就很重视假子山矿产的战略价值，情报较深入，一实行军政统治，立即将假子山小学的青年夫妇教师梁廷业和陈凤娥逮捕，当场杀害。日本垄断财团忍痛撤出假子山，正是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窘相毕露的缩影。

当年秋间，方壮志秘密联系上老杨，说明于1942年7月

在双溪大年被捕，与原马共栢城地委委员、亦已被捕的小波等人同敌人委蛇应付，被迫在栢城宪兵部工作，表示希望继续为抗日事业工作。老杨要方壮志等人在栢城散发抗日传单，以作考验。壮志等散发几次抗日传单，以表明继续抗日决心。1944年夏末，老杨派遣被安排在阿罗斯打华侨协会工作的伍仙护去栢城，在四方楼（警察总署）邻近的方壮志家中，叫来小波，传达老杨所布置的任务：消灭栢城宪兵部两个最嚣张凶狠的叛徒特务庄锡枝和大头。方壮志与小波等共5人，集体研究执行这个任务的行动计划，将锡枝和大头骗至华人公墓（Batu Kanjamg），5人一齐动手，将锡枝和大头用刀刺死。不料大头伤重没有即时断气，在医院病床上向宪兵讲述被杀经过。结果壮志等5人都被捕，受尽毒打后全部被处绞刑。

老杨数次来往于纯笃和牛仑之间，组织锄奸工作。强华、李坚、卫忠、奋光最为活跃，首先在假子山一带铲除3个破坏抗日宣传与募捐活动，欺压剥削工人的包工头。假子山的治安维持会长王喜，在陈古反复教育下，表面与警察所协作，暗地里接受游击队安排，儿子离家参加游击队。

黄志成和庄健英于1942年夏季分别被捕，押到双溪大年宪兵部严刑拷打，两人坚持不承认参加抗日组织，没有证据，不久被假释外出。志成立即避往加央港口（Kuala Perlis），在抗盟负责人林惠民、朱纯德的沟通下，和纯笃、加基武吉、樟仑、亚娄各地抗盟取得联系，在加央港口渔民当中开展隐蔽的抗日宣传活动。志成精通马来语言与习俗，在占加央港口渔民总人数70%以上的马来人当中，很快就取得信任和好感。港口抗盟筹足资金购置一艘人力驶帆小渔船，由惠民、纯

德及受栢城宪兵部通缉的原栢城青年联合会主席周国斌，以“打渔”为名，来往于玻吉栢威小港口之间，为各地抗盟传递信息，侦察日军动态。玻璃市和吉北数地的日军警备队 3 个中队 1 个大队，不满足于水产组合强夺巧抢的鱼虾供应，由加央警备中队从马六甲海峡夺取一艘商用机动木船，强迫港口华侨渔民温河成和黄文添（两人都是抗盟会员）为其驾驶及捕鱼，两个武装日军随船指挥和监督。捕鱼量少时，就强迫其他渔船“Yuku Yuku”（友好友好），将所捕获鲜鱼部分搬到日军渔船上去。志成等人决定拔掉这枚渔民们的眼中钉，和河成、文添相议，订出海上歼敌具体计划。

中秋节刚过几天，暮色朦胧的傍晚，日军渔船缓慢驶近班茶港口（Tanjong Dawai）暂时停泊，惠民、纯德等将渔船驶近日军渔船，惠民下水潜游到日军渔船底下，用凿子将船底板凿个大洞，发动机的响声掩盖了凿船的声音。等到海水大量涌进船舱时，两个日军慌了手足，放下步枪帮助堵水，两个渔工故意大惊小怪，分散日军的注意力，分别用随船铁器将日军击昏，然后丢下海峡。机船逐渐下沉，熟悉水性的温黄两人，将两支三八式步枪和 30 发子弹递交给已经游回自己渔船的惠民和纯德，然后纵身跳下海峡，游向班茶港口，爬上岸来向警察局报告：“渔船不知何故漏水，只好弃船逃命”。加央警备队到现场查清机船底板似被凿穿，将班茶 40 多个华侨渔民全部逮捕，押解双溪大年宪兵部拷打审讯，毫无线索，关了 3 个月，才由班茶维持会担保释放。

黄志成、张石头、彭汉强、陈明杰等人，事后在加央港口至亚娄一带，流动袭击深入农村，胶园活动的暗探和马来警察，收缴步枪 7 支、手枪 1 支、日式木柄手榴弹两颗，打

击了玻璃市地区警探的嚣张气焰。

吉北抗日游击队在靠近泰马边境纵深 30 公里、绵长近百公里的区域内，设立 7 个交通站，别动队来往各地之间，惩奸除恶，都能得到较好的职业掩护和生活照顾，并提供敌奸活动情报。各地抗盟组织与部队之间配合比较密切。面对没有职业的外来生面人，一般群众不敢接近，又易引起暗藏的日特线人注目，群众掩护非常重要。赖金锋和强华、邓文龙、蔡文珠等人是这一带民运工作的负责人。游击队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工人、农民、店员、商贩的同情捐，包括现金、粮食和生活用品。假子山工人将自力淘洗的钨砂，大港尾工人自淘的锡米，以较好价格卖给泰南万源兴公司或昔罗县振和锡矿公司，为防土匪小团伙中途抢劫，都是集体结伙而行，由游击队派出熟悉地形途径的卢能、赖华、文山等等战士陪行护送，绕过日本垄断组织和边境海关人员的检查阻禁，工人自动捐助现金或生活物品。山区小路崎岖，跋涉艰难，他们从泰南赶回生猪，挑回白糖、烟丝或椰油，都是马来亚奇缺的商品。游击队也在泰南购买药品和少量手枪、子弹，武器大都是通过中间人向泰国下级军官购得。马来亚内地不少商人，也来吉北地区抢购大米（受马来军政府控制，也有“后门”可走）和副食品。边境几条山路，少量走私长年不断。几小股打抢团伙，给抗日游击队打跑后，不久又溜回来，这是军警少管地带。

1943 年 10 月 18 日，日本正式将玻璃市州、吉打州、吉兰丹州和丁加奴州划让给泰国；玻璃市和吉打两州改名西武里。虽然大部分马来人对名义上转归祖辈宿敌统治产生潜在的反感，但小部分欺压人民群众成性的马来警察，却抱着

“谁当皇帝我当差”的心态，继续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破坏抗日。吉北抗日游击队决定进攻几所警察局，既可夺取武器，又可杀一儆百。

刘强华、亚友、日新带领3个战士于夜深人静时，突然冲进纯笃警察所，来势凶猛，往屋顶开了一枪，6个马来警察不敢抵抗，缴出4支来福枪及60发子弹。次日，警察们怕被日军追究责任，全部逃回农村老家。续后调来6个警察，5个双眼只看自己鼻子，1个还在街上吓唬群众，经过治安维持会长暗示性“劝告”后，明白远离漳仑警备队16公里，远水难救近火，态度也就软化了，看见贴抗日标语，就掉头走开。戴翔带领4名战士，趁加基武吉警察吃饭之际，冲进警察所，收缴5支长枪。黄志成又布置绰号神枪手的朱纯德在新路村外，白日处决暗探线人陈和仔。别动队来往倏忽，灵活机动，有着抗盟的指引和群众的掩护，各地警备队东奔西跑，南寻北找，始终无法查到别动队的踪影。

1944年初，由陈忠、戴翔带队，率领卫忠、奋光等20多名战士，赖金锋殿后，从大港尾基地出发，先到新路村边驻脚，晚上从胶园小路往西南急行，直奔亚顺(Asun)警察局。亚顺位于驻有警备大队的日德拉北面10公里，驻有警备中队的漳仑南面10公里，很容易受到日军夹击。游击队在黑暗中俯身摸近警察局，自窗中窥望。值班警察在打瞌睡，为避免响枪惊动可能在巡逻中的日军，一个小队留外警戒，一个小队从窗口爬进，制服值班警察，控制通道后，才将睡眼惺忪的十几个马来警察全部赶到办公室集中，垂手站立。游击队用马来话教育宣传3分钟，讲清日本是三大民族的共同敌人，只要不反抗；抗日军不会伤害马来警察；对个别行为恶劣的

警察点名警告。不鸣一枪缴获长短枪 12 支，扯断一段电话线，才在黑暗中往东南撤走，以迷惑警察，走一小段才折向东北，归返基地。

9 月，刘强华带领一个年轻战士，黄昏后潜入亚娄市区，在日军军服加工厂路旁守候，年轻战士保持 10 几米远看风。当作恶多端的军服厂长中村嘱托乘坐小汽车开出工厂大门将转上马路时，强华开枪击毙日军司机，闪电般冲近汽车，往后座连枪射击，中村嘱托及一军官未及拔枪反抗，一个当场殒命，一个送进阿罗斯打医院才断气。强华两人迅速穿过小巷走出郊外，由胶园小路安全撤退。亚娄警备队白花气力忙乱了一个晚上。几年间，强华及所领别动队前后消灭日军、暗探、土匪 14 人。强华父亲刘汝文，1930 年曾任广东省紫金县苏维埃农民协会主席兼自卫队长，后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人头示众 3 天，强华由叔父刘汝祥带领南逃马来亚。当时，亚娄、加央、新路、纯笃等吉北、玻璃市地区的抗日同盟会直属吉北抗日部队领导，偷袭警察局（所）、军服厂的情报，都由该地抗盟调查、提供，所以筹划切实，行动顺当。

游击队胜利出击的消息，激奋群众抗日情绪，鼓励更多矿工和农民青年踊跃参加抗日武装部队，叶生、陈生、曾棠、钟松、添胜、楚山、顺城、志勉、元林等等，稍后的乡镇学生巫日明、杨官盛、王锦发、觉非、李云也相继入伍，抗日战士已近百人。陈鲁也于这时被调到吉北部队，加强领导力量。

12 月下旬，经过亚娄抗盟与交通站工作人员周密侦察，掌握了镇内日军后勤仓库的建筑结构和守卫力量，白日站岗盘查进出仓库人员及提货手续，晚上即关门睡眠值夜。缜密

研究部署后，由陈鲁率领一个特别挑选的精悍小队，包括戴翔、陈忠、卫忠、国联、奋光等十儿人，夜行昼宿，在新路村边隐蔽休息一天，傍晚由橡胶园小路向西南急行十几公里，半夜进入阿娄镇，从偏僻小道避开日本警备队巡逻队（泰警从不夜间巡逻），由小巷摸近仓库，撬开后门进入屋内，留下警戒，其他战士轻手蹑足直上二楼，静悄悄地用刀刺死睡眠中的两个日军管理员；另一仓库主管被啊哟声惊醒，问一声：“拉列（谁）？”伸手摸枕下手枪，来不及开枪便被刺死。游击队缴获一支日本曲尺，两支步枪和一挺轻机枪，搬走一些军服和药品。这回奇袭是利用日军的骄傲麻痹心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在日本警备队和泰国武警眼皮底下，捋掉虎须，悄然走进，安然撤出。

在加基武吉至纯笃的泰马边境上，原有3股枪劫山路来往商販的土匪小团伙，威胁强迫乡镇商販交纳“保护费”，年底以前，都在抗日游击队的警告和武力威胁下，相继被赶走（以后几度回窜，在抗英解放战争初期才加以消灭）。邻近的华人和马来人村民，为驱除几股匪徒而对抗日游击队和抗日同盟会增添好感，增进军民密切关系。

1945年2月，吉北人民抗日游击队党代表陈古和陈鲁以及泰国人民抗日义勇队领导人木华、陈超开会研究，认为接近泰国的巴东勿杀火车铁桥。日军防卫力量不强，可以武力掩护炸毁，政治影响较大，决定由陈鲁带领一支精悍小队执行炸桥任务。吉打部队派出戴翔、卫忠、奋光、直民、白杨、志业6人，泰方派出陈超、小周、小鲁、××4人参加，全队11人。队伍全部是日军服装，只是绑腿之下不穿日军反皮军靴，而是穿上汽车废轮胎制成的夏凉鞋，战士们称它“水陆

两用坦克”，几年间行走热带崎岖山路跋涉山泉溪涧，最适用的就是这种夏凉鞋。陈鲁腰佩曲尺，卫忠扛着轻机枪，其他人肩挎三八式步枪。急行50多公里，傍晚到达巴东勿杀，潜伏在山上丛林间，居高临下观察守桥日军的动态。晚上，两位战士方才避开灯光摸下桥墩放置炸药（来自假子山矿场库存）。不料脚踏卵石响声，惊觉守桥日军，放置不成，小队只好以火力掩护撤退。驻防日军分队在夜间虽然无法追击，但是游击队撤退方向，却被沿途暗探线人查清。

第二天晚上，游击队回到新路村后小茅屋中，战士们连衣抱枪卧地睡觉。下半夜，稀疏星光时隐时现，漳仑和亚娄的日军警备队各一个中队，分成3路包围新路村，分头向村里合围摸进。在面向亚娄沙土路上放哨的战士，模糊看到弯腰轻步从大路上逐渐逼近的日军影子时，立即掷出一颗英制蛋形手榴弹，没有爆炸，只听到钢盔挨到飞来物突然一击的日本军官，低声骂了一句“Bakero（马鹿）”！从纷杂的军靴沙沙声，听出日军不只三几十人，不敢打草惊蛇，暴露目标，急忙从小路跑回住宿茅屋，逐个拍击睡眠中战士的大腿，连续小声喊叫：“日本鬼来了，日本鬼来了”！惊醒的战士急忙从屋后撤退，各自跑到村外山边预定紧急聚合地点集中。

勇敢沉着但已是壮年的白杨，两天两夜急行军，赶了百零公里山路，太过疲倦，战友们撤走时，就地翻一翻身，又睡着了。结果被包抄摸索进来的日军捉回亚娄警备队，后转押阿罗斯打宪兵部，严刑拷掠。白杨坚贞不屈，越刑越骂，被日寇捆在木椿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白杨是假子山矿工，无力寄钱回台山供养父母，深感内疚，取名“白养”自责，参加抗日军后才改名白杨。

卫忠醒时较迟，模模糊糊，黑暗中不明究竟，提着轻机枪扑在茅屋旁草地上观察周围形势。不料恰是插在伏地横排待命的日军队伍中，被日军军官踢了一脚，压低声音骂句：“马鹿！退后！”卫忠会些日语，这才醒悟，用日语连声回答：“Hai, Hai”！急忙蛇行后退，离开伏地横排日军队伍，然后起身弯腰走进树胶园林。等到日本军官发现蹊跷，从后开枪射击时，卫忠已经走进密林了。

日军立即在新路村逐家逐户进行搜查，逮捕了几十个青年店员工人和农民，缚住双手集中看管于小街尽头路旁空地。接着强迫酒店茶室和商店在日军监视下，为200多名日军烧饭做菜。

游击小队在预定地点集合后，天色未明，马泰双方战士经过研究，估计日军调集数百兵力扑了一场空，老羞成怒，肯定要残害无辜百姓，虚报战功，游击队如果就此撤走，会在各族人民中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今后抗日工作的开展。决定返身打阵回马枪，出其意料之外，攻他措手不及，可以狠狠打击日军的嚣张气势，大大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于是陈鲁布置反击战的作战计划，小队分为3组，拉开距离以增大杀伤范围，并分散敌军火力。10人马上快步赶回新路村，东方开始出现一抹晨光。游击队到达新路半边小街对面的树胶林里，藏身树后，窥看日军动态，林中还是一片漆黑。

日军各小队分别围成小圈，蹲在地上吃饭，有些吃饱的在埋头啃嚼从农田里抢来的西瓜，三八式步枪都分伍架在大路上。藉着树干蔽遮，战士们分开转移到离大路80米以内的距离，陈鲁短枪一响，轻机枪、步枪一齐对准日军猛烈开火。首批20几个日军应声倒下，其他的日军慌了手脚，急忙从大

路中间抢过步枪和轻机枪，仆地向黑黝黝的树胶林里漫无目标地胡乱回击。街头几十个被捕群众，趁机一哄而散，从另一方面的木茨田走向荒山丛林。

几分钟后，日军指挥官方才判断出游击队人数不多，派出几个士兵从胶园右边迂迴包抄过来。游击队凭着橡胶树的遮掩，往后撤退，迅速脱离战场，重新回归山边预定地点集合。不幸的是，年轻、勇敢、机警、坚定的泰国人民抗日义勇队战士小周（祖籍海南），却在这次反击战中牺牲了。日军死伤 40 多人，运往阿罗斯打医院抢救的重伤员就有 4 大卡车。日军故技重演，放火将新路街场全部烧光。

新路反击战的胜利消息，不胫自走，秘密传遍玻璃市州，吉打州和泰南地区，喜悦的群众将胜利消息越传越奇，说是“中国八路军派大军来了”。邻近马来农村的农民，鼓起很高的拥军热情，以为抗日军最少有几百人，顿时送来 8 条黄牛、要新路抗盟转交给抗日军作慰问品。部队只接受其中一条，其他 7 条退还给马来农村牛主。接收的一条，把大部分牛肉送还马来农村，让马来农民群众“坤都利”（Kenduri 大宴会）庆祝胜利。胜利消息鼓舞更多青年投向抗日武装队伍，由陈忠负责的步兵操练工作，从个人操作劈刺发展到小队、分队作战队形演习，大家都在积极准备迎接配合盟军反攻的大决斗。

3 月，马来亚共产党吉打州特别支部张云、陈古、陈鲁 3 人，经过分析形势，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吉玻两州抗日武装，民运及人民抗日同盟会的统一领导，加强组织建设，同时稳步发展党员。马共自 1930 年 4 月 30 日成立以来，因属非法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1941 年 12 月 18 日，虽由英国驻新马总督汤姆士宣布马共合法地位，但战争期间，日军镇压对

象，首先针对马共，因为它是抗日反殖抵制军国主义的中坚力量，所以马共的组织与成员，长期来都不公开。特别支部决定将吉北及吉东抗日游击队统一改称“吉打人民抗日军”，同时将陈鲁、老杨、卫忠、国联、李群等骨干调往吉东部队。吉北部队经过调整，陈古仍任党代表，队长戴翔，副队长刘强华、梁志业，参谋西风，政治员陈春梅，教练陈忠，事务长长宏（阳光）、保管巫阿友。

吉打人民抗日军吉北部队，在向日军及其附庸军警发动进攻时，多次和泰南人民抗日义勇队进行密切的配合，并肩战斗。

（三）与泰国人民抗日义勇队联合作战

暹罗（SIAM）于1939年5月20日改名泰国（THAILAND）。1929年在曼谷（BONGKOK）由华侨和华裔知识青年组织暹罗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1942年正式成立泰国共产党，长期处于秘密地下组织活动。銮披汶（Pibul Songkram）于1938年担任国务院长以后，推行法西斯统治，加强镇压民主运动和排华。1941年3月，泰国和日本签订日泰攻守同盟协定。1942年1月25日，泰国加入德意日轴心集团，向英国及美国宣战。1943年7月，日本战时内阁首相东条英机至曼谷和泰国议定日泰“共荣”大计，日本将玻璃市、吉打、吉兰丹、丁加奴4州划归泰国，泰国则向日本提供米

粮、树胶、锡和柚木等战略物资，由日本在泰国建立汽油库、军需补给站，飞机场等等后勤设施。当时日本南云舰队已被歼灭，完全丧失制海制空权，非常需要泰国支援日本南方军的后勤补给。泰国銮披汶政权自愿套上日本战车的圈套，加深了泰国人民的苦难。

日军侵略马来亚初期，泰国共产党在泰南地区以泰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名义开展秘密的抗日活动，1943年3月间，工作委员会曾易名中央委员会。当时首要任务是配合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组织反抗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由于泰国处于銮披汶的法西斯统治之下，中部与东部地区日军与泰军控制力量较强，缺乏抗日活动的组织基础；西部与北部山区人烟稀少，群众抗日意识不强，而且远离日军驻地与日军军需交通线；南部地区日军与泰军军政控制虽稍严密，但是华人较多受马来亚抗日救国运动影响，抗日意识较强。泰南4府，马来人基于历史原因，早存分离愿望，一般不与泰军、日军合作；更重要的是马来亚吉打州靠近泰国边境的山林地区，已有相当活跃的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部队，可以互相支援，协作行动，共同抗日。因此，泰共泰南组织决定将成立抗日游击队的基地，选择在泰国南部靠近马来亚边境的耶拉府（YALA）、宋卡府（SONGKHLA）边境山林里。初期，泰共缺乏武装斗争干部，经济相当拮据，又没有适用武器，万事开头难，处境艰难，急于寻找吉打人民抗日游击队联系线索。

原合艾王振武锡矿公司的经理陈介铁，年轻时（1927年4月）在中国广东省东江地区参加土地革命，受到国民党军队缉捕，逃到泰国。王振武公司的锡矿在泰马边境斜谷芭、端国、白石港、乌泥港、双溪拉雅一带，介铁经常到这些矿场巡

视。吉打人民抗日游击队也时常到这一带活动，矿工中不少抗日活动积极分子，加以介铁 1942 年在纯笃白水河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旧缘关系，又和思想进步的泰国朋友素有联系，于是通过介铁的穿针引线，从中搭桥，泰共与马共吉打州组织就接上了关系。初期泰方的交通员是赖华。

1944 年初，在泰南昔罗县哥迈山 (Bukit Kohmai) 顶上，靠近边境的斜谷道锡矿场，泰共与马共吉打州特别支部 (人民抗日军核心组)，双方举行第一次联系会议。泰共代表陈木华和张迟，自称是泰国共产党南线特别委员会的书记和副书记，马共吉打特别支部代表陈古和陈鲁。两方虽是初次晤面，共同信念和联合抗日的强烈愿望，却使彼此产生一见如故的战斗情谊，4 人的观点、态度都很一致。会议达成框架协议 5 条：1. 马来亚方面全力支持泰南特委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心和计划；2. 双方同意由泰方派出一些人员，在吉打人民抗日军基地中学习军事常识，参加军事训练，共同生活，共同参加战斗和进行各类军事活动，在条件成熟时，回归泰境开展武装抗日活动；3. 生活与活动费用全部由马方负责，武器由马方筹措配备；4. 泰方答应在泰国境内帮助马方购买枪支和弹药；5. 泰方答应派出干部于泰国境内农村采购和取得粮食供应。

会议后不久，由张迟带领 7 个泰籍华裔青年，到吉北人民抗日部队驻地。泰南战士之间，用泰语会话，和马方战士交谈，即用流利的普通话 (华语)。吉北部队驻在麻勒河紧靠泰马边境大森林里的战士，只有 50 多人，当时正处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初期，双方战士共同学习政治理论，时事形势和军事常识。在马境漳仑，纯笃、假子山、石港、大港尾、麻勒、

双溪槟榔、巴麻山、大陂头等小乡镇和农村矿场，都是华人聚居的地方，群众部分参加抗日同盟会，多数以同情捐和捐粮捐物支持抗日斗争。在泰境多于端国、谷斜芭、白石港、乌泥港等矿场活动，居民大部分是华人，渗杂一些暹人。游击队也在古务（Kubo）、同耀（Tungiao）、甘文芝、万甲、万迈、万、高申、万降、拉邦等乡镇开展抗日宣传。居民大都是泰族农民（暹人），主要产品是稻米、杂粮、猪牛羊和鹅、鸡、鸭，自给自足，与世无争，虽也不满日军侵略暴行，但未身受其害，反日情绪不如马方强烈。抗日部队活动区域，群众基础一般比较好。

吉北战士，多数来自矿区的华侨矿工和玻璃市、吉北种植木茨的华侨农民，中学生很少，读书少、文化低，理论水平较低，但是朴素的抗日热情很高，责任心很强，刻苦耐劳，劳动麻利。泰南战士是经过挑选的泰共中下层干部，多数有中学文化水平，有一定的政治理论修养，但是一般少受艰辛的劳动锻炼。因此在亲密无间的革命友谊比赛中，“武”的方面，劳动操作，砍竹搭棚寮，农村运粮跑山路、涉溪涧，几乎都是吉北战士获得优胜。“文”的方面，文化知识，政治常识，宣传技能，经常是由泰南战士领先。这就造成彼此之间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切磋，精诚协作的良好气氛。吉北部队的陈忠，国联等人，抗日之前曾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卫忠、强华等年青的“老”战士，则有两年多锄奸的实践经验。泰南几批受训战士，普遍觉得确是投进一所理论结合实践、生动活泼的山林游击“学校”，情绪愉快，斗志饱满。

泰马抗日战士第一次协同作战，是1944年11月初，进攻泰南昔罗县古务警察局。先由泰国义勇队派遣当地人员，详

细调查古务警察局的位置、结构、环境、警察人数、武器装备和工作时间等等细节，双方据此制订具体作战方案。由陈古带领 14 名吉北战士（唯一的女战士是卫生员陈春梅），泰南战士陈超、小周、小罗参加。趁着下弦一弯眉月，往西北急行 30 多公里山路，白天在山林间隐蔽休息，第二天晚上才抵达古务警察局邻近树胶林中，距离警察局只有几十米，全部伏地静观动态，任由热带巨蚊叮螫不敢动弹。事先侦察虽细，却没有注意到警察局里有一条守门狗。守门狗发现胶林里有人，烦躁不安地不停吠叫，引起值班的泰国警察怀疑，几次走出大门外探望，没有发现可疑动静，以为是守门狗盲目乱吠，就地拾起小木块往狗身上摔去，吠声暂时停息。泰警闭门进内，为防意外紧急需要使用，将串连 12 支三八式步枪的铁链锁头打开，然后回房继续睡觉。就在这一瞬间，抗日战士跑步冲上台阶，踢开大门，冲进警察局，往集体卧室开了一枪，几个泰南战士齐声用泰语高喊：“缴枪不杀”！13 个泰国警察从睡梦惊醒，不知虚实，不敢反抗，相继从窗口跳出逃跑。泰马抗日战士顺利缴获 12 支步枪和一批子弹，由陈超用泰文写下“借条”，表明战斗对象是日军，不是泰警，署名是“泰国人民义勇队”。队伍趁着夜色撤离古务，循着原路回归吉北大港尾基地。

泰南抗日战士在年底和 1945 年初，先后参加了偷袭亚娄日军后勤仓库和新路反击战等战役，并作出了牺牲。

泰南特委布置一些泰共党员，帮助吉北人民抗日军向泰南农民收购粮食、食油和少量武器弹药，那是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从宋卡和北大年登陆，泰国驻军出于误会，慌乱中抵抗失败后丢下的步枪；另几支是少数英军在昔罗意外遭遇日

军先头部队，溃跑时丢下的来福枪；有几支手枪是泰国个别不满銮披汶统治的下级军官私售的。吉北人民抗日部队的粮食（大米为主）供应长期比较稳定，泰马两边农民都作出直接（捐助）或间接（出售）的支援。泰马双方小商小贩的捐助多是现款。日军和税务人员明知有几条逃税山路，但是漫长山野，人少不敢来，大批军队又像拳头击蚊子，闻风就飞掉，所以长期间张大眼睛，只看不管。这有利于输送供给吉北人民抗日军的物资，数量虽少，但不匮乏。

泰南战士在北马训练三几个月就换班，个别人继续留下，以便以老带新。大部分由泰南特委调走，另派一批战士，轮换训练，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前后总数约近 200 人，和第一批一样，全部都是斗志昂扬朝气蓬勃的华裔泰籍青年。据说因语言关系，少数不懂华语的泰族知识青年，只好留在泰南训练。

1945 年初，派到吉北参加训练的泰南战士约近 100 人，正式成立“泰国人民抗日义勇队总队部”，也就是泰国抗日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总队部党代表陈木华，队长范克生，副队长柳旦，政治部主任陈超。另有参谋长及后勤部主任。泰南抗日战士，急速增加，积极准备配合东南亚联军的反攻，消灭泰国境内的日军，切断马来亚日军的退路，推翻銮披汶卖国统治集团，争取泰国人民民主自由解放。此际，战火已经逼近德国和日本本土，马来亚和泰国的日本驻军士气明显低落。

5 月，东南亚联军总部开始向吉东和吉北的人民抗日军空投联络人员和武器等物资，泰马人民抗日战士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增强。

6月，在一个晴朗的晚上，由陈木华带队，率领泰国义勇队12名战士，吉北人民抗日军6名战士，由纯笃跨过宽西冷山，沿着昔罗河北上。次夜，从胶林小路逼近昔罗县那他威附近苏巴约(Supayo)，以散兵队钳形向岗上日军据点发动进攻。原想以强大火力迫使一小队日军从山后撤走，不料日军刚在换防，两小队日军凭借砖木结构小堡顽强抵抗。这次又是侦察不周，恰巧碰上换防期。日军小堡地势稍高，硬冲将会造成重大伤亡；日本守军看到抗日军火力猛烈，也不敢冲出，黑暗中摸不清抗日军兵力，只能死守。驳火5分钟，双方仍是胶着状态。木华于是下令后撤，由吉北战士掩护断后。这次战役虽未取得战果，但为新战士提供实战演习机会。

7月，木华又率领20名泰马战士混合队伍，白天急行军绕过纯笃进入泰南，在山林中休息，晚上快步赶到距离马来亚边境不远的康月火车站，分两路冲进车站。几个泰警听到枪声，往前开两枪，回头就跑，他们知道游击队打击对象是日军，不愿无辜当替死鬼。抗日军占领康月车站一段时间，不见火车经过，拦截不到日军军需火车，于是在车站写上大量抗日泰文标语，才整队撤退。带来准备炸毁日军军需车厢的炸药，没有转用于炸毁路轨，因来往泰马谋生的群众很多，怕会伤害到贫苦老百姓。

每次战役之后，义勇队和吉北部队一样，都在木华、陈超主持下，开会总结战斗经验教训，提高队员的作战知识、行军须知和侦察事项的认识，邀请吉北老战士参加。战役总结会议，作为军事训练的补充生动课程，很逼真深入，效果很好。

吉北人民抗日军党代表陈古，6月间曾向东南亚联军派

驻吉北人民抗日军的联络官提出要求，请他们转告驻印度的东南亚联军总部，希望直接和泰国人民抗日义勇队联系，并投给武器装备，以利于联军反攻马来亚时，义勇队可在泰国南部切断日军的后勤供应，并对日本马来军区产生威胁作用。结果没有得到回讯。可能是东南亚联军总部不同意此建议，也可能是暗藏严重反共情绪的联络官根本没有将此建议转告东南亚联军总部。驻吉打抗日部队的联络官以希士乐（Hislop）少校为首，狂妄自大，蔑视黄种民族，拒不执行为抗日军军训的指令，擅自扣压建议是合乎逻辑的。

1945年7月，义勇队分配一个小队转移到吉打人民抗日军吉东基地驻扎，参加实战演习，由志勇带领，另有志明、志强等11名战士。志勇还参加处决日本奸细行动。他们是来打前站，准备继续派送大批义勇队前来参加军训。吉东抗日军基地位于华玲北面35公里荒山丛林中，东距泰国耶拉府西部山区只有20公里，山高林密，山涧纵横，往东北80公里，就可从耶拉切断日军撤往北大年退路，确是游击战争的有利战略据点。

出乎意外，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就宣布《终战诏书》，无条件投降了。

8月17日，吉北和吉东4个中队人民抗日军。全部移出山区基地，分别暂驻纯笃和万那村，而后分兵进驻各主要城镇。泰国人民抗日义勇队参加军训部队，也分别撤回泰南地区，对耶拉地区少数日军据点，经过说服，收缴部分武器。义勇队战士回归泰南时，全部配备卡宾枪、斯汀枪、手榴弹，子弹各150—200发，分队另配轻机枪，吉东部队各增加配备航空曲尺一支（吉北空投手枪很少，未能配给），总的随身武器

配备，略优于吉打战士。另有一部分武器，伪装为货物，从火车运往泰南，途中被泰警查获，全部丧失。泰马人民抗日战士，在抗日战斗中互相支援，互相帮助，战斗情谊比拟高山榕树，盘根错节，百年常春。

（四）联军与人民抗日军的联系

东南亚联军总部于1942年7月，决定在马来亚建立敌后第五纵队（内部称为一三六部队，Force 136）。同年12月，中国政府代表吴铁城与英国驻华大使山森（Samson）在重庆签署协议，由中国政府派遣适应在马来亚敌后工作的人员，分批到印度接受游击战术训练，从1943年1月16日开始，前后参加受训的华人，大部分是马来亚侨生，因为他们有熟悉马来亚多种语言及各民族风俗习惯的有利条件，便于进行敌后工作，大多经过中国军统的培训。他们在印度参加一三六部队，组建为龙队（林谋盛任龙队马来亚区区长），在锡兰岛军港附近小岛上，接受秘密通讯、侦察、跟踪及反跟踪、枪击、电讯、爆炸、伪装、假口供等等技艺训练。5月11日，由台维斯上尉带领谭显炎、吴在新、李汉光、龙朝英及谭云彪等6名龙队成员（谭云彪后被遣返印度），乘坐一艘荷兰潜水艇从哥伦坡（Colomb）出发，24日在霹雳州邦咯岛附近登陆，7月28日才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取得联系。此后数次由潜艇运送一三六部队人员潜入马来亚霹雳地区，11月2日，林谋

盛也在巴眼拿督 (Bagan Datoh) 由龙朝英接应登陆。根据联军东南亚总部指示，一三六部队人员只负责联络和情报工作，不参加作战，每逢日军进攻，都在抗日军掩护下先行撤走。平时，在抗日军保护下进行工作，并由抗日军提供生活供应。查普曼 (F. S. Chapman) 在《森林中的游击生活》文中承认，一些一三六部队人员能够生存下来，全靠人民抗日军的照顾；当游击队员以木茨果腹时，却以鱼、鸡、蛋、牛肉、猪肉供应他们。一些不听劝告，离开山林营地到市镇活动的龙队队员，都相继被日军逮捕。

1943 年 12 月 30 日，查普曼、台维斯 (John Daris)、布伦米 (Richard Broome)、林谋盛 4 人为东南亚联军代表，与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马来亚人民抗日同盟会代表张红 (莱特)、陈平，在霹雳州南部美罗 (Bidor) 东部山区白兰丹 (Blantan) 抗日军营地举行两天谈判，最后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协议规定：“在联军反攻马来亚时，马共将予充分合作，为此目的，将接受联军统帅在马作战的有关命令”。马共向联军提出具体要求：供应武器弹药，药品及医生，军事训练和财物资助。最后附加条款：“马共与联军的合作，必须持续到联军能完全维护马来亚的和平与秩序的时候为止”。双方签字人分别为台维斯、布伦米、陈春霖 (林谋盛) 和张红。联军代表显然贯彻了英帝国主义企图恢复马来亚殖民统治的野心。叛徒莱特已经包藏在日本失败后，重新出卖马来亚人民利益，回身投靠英帝的祸心。不过，协议也有助于增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武装配备和抗日物质力量。吉打人民抗日军指战员只被告知，联军将根据协议，提供武器装备支援，无人知晓协议原文。

一三六部队由于海上交通断绝了几个月，无线电通讯器材（收发报机）损坏，好几期潜艇接应失败，由锡兰开出的潜艇3次无法取得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一三六部队的接应联系。1944年3月下旬林谋盛等5名龙队人员，相继在霹雳中南部市镇被捕，与联总的联系中断10个月。1944年10月，修理好无线电收发报机，方才恢复与东南亚联军总部的联系，经过盘诘考审，联总确信不是日军套设陷阱，联系恢复正常。1945年初，在印度开始训练龙队人员跳伞技能，龙队四组、五组、六组从2月26日开始，分别空投到马来亚霹雳州（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基地）、柔佛州南部（第四独立队）、吉打州（吉打人民抗日军）、彭亨州西部（第六独立队）、雪兰莪州（第一独立队）、森美兰州（第二独立队）和柔佛州北部（第三独立队）。东彭亨州（第七独立队）始终没有得到空投联络人员。各地分别取得联系以后，才空投武器与物资。

吉玻两州沦陷又早又快，马共特委没有机会选派党员参加新加坡101特别训练学校受训，在沦陷初期3年，没有和英军或联军发生任何联系。

1945年2月27日（农历己酉年正月十五日），夜深未晓，吉东牛英村的抗日军交通站民运人员，借着月光，发现一架4引擎的飞机在上空盘旋一周后，逐渐降低，有几个人张挂降落伞，飘落在北部山林中。赶快派人通过机房飞报抗日部队。抗日军由老杨带队搜寻，却找不到空降人员踪迹。原来是东南亚联军派遣的联络人员，由英军少校希士乐带领龙队张朝国、陈国英、林宏培、曾振文、黄瑞生等5人，26日下午自印度起飞，将和吉打人民抗日军联系，作好迎接联军反攻的准备工作。事先没有联络通气，结果在深山中迷路，并受日

军华玲警备队的追击搜索，日军劳而无功，白忙一阵。派到双溪拉冷侦察的暗探，化装成农民，当地农民一眼就看穿，由蔡烽火带领别动队捉回山边处决。阿罗斯打机场残余的日军战斗机，即不敢起飞迎击。美空中堡垒 B24 和 B29 重型轰炸机，飞行高度 11000—12000 米，日机飞行高度不超 8000 米，每次迎击，美机自上朝下俯射，日机只有挨揍，所以不敢起飞堵截。联军已得制空优势，昼夜都能自由航行。由于希士乐刚愎自用，急躁妄为，武断瞎指挥，致使小组人员在山中乱闯胡转 9 天，还找不到抗日群众，干粮吃尽，只好两次拍电印度要求救济，又饿又累的龙队人员砍除灌木，烧火为号，让飞机空降粮食，可是落点不准，又给马来人取走几件。希士乐只会指手划脚，全靠龙队人员分头探路，林宏培终于找到牛英村，立即被老杨、坤山等人抓住，宏培从容交出手枪，讲明身份。老杨即放宏培找回其他 5 人，带返邻近抗日军营地的另一个山头，分配陈斌率领一小队战士帮助搭建棚寮，战士们就近住宿，担任联络和保卫，也帮助解决生活需要。抗日部队为方便彼此自由活动，没有同意联络人员和抗日战士同营地住宿。

希士乐胸怀狭窄，疑心很重，和印度联总通讯联系时，要求另派警卫人员，联总于 3 月份就空降警卫小队廓尔喀士兵 18 人。陆续派来英籍尉级军官和美籍军官 4 人，且有华人翻译员，电讯员和军械维修员，同时空投联络人员的生活用品，食品、帐篷、通讯器材和轻武器。希士乐不许抗日战士走近他们的营地，英帝在利用人民抗日军帮他们火中取栗，又在抗日军背后安上枪洞，殖民帝国深谋远虑，未赶走日本侵略军，已经策划筹谋恢复马来亚殖民统治的准备工作。英殖民

部在1943年已经规划战后继续统治马来亚的蓝图；1944年5月底，英国战时内阁已经决定战后，将檳城及马六甲与9个原马来联邦、属邦合共组建为马来亚联邦，继续推行殖民统治。

5月份，联络官通知抗日军，联军将来空投武器和物资给人民抗日军。部队立即组织警卫与交通搬运人员，偕联络官共同选定空降地点，在远离牛英村的北方山谷中，砍除5亩左右（约3000平方米）的灌木杂树，在3个篮球场大小的旷地边沿，按三角图形堆起三堆干树枝，周围山上布置岗哨了望。下午2时许，无线电收发机收到联军飞机的联络讯号，立即点燃3堆干树枝，然后在炎烈的火焰中撒下湿树叶，三柱浓烟冲天而起，高空白天看浓烟比火光更清楚。从远而近的波音B29轰炸机，绕着烟柱飞了一圈，首先投放联络人员需用物资，然后投放少量供给人民抗日军的武器装备和食品用品。投放降落地点不很准确，战士们要在周围的山地丛林中寻找空投的柱形圆桶和帆布袋，集中交付联络官统一登记核对。空投过程，动员30余名后备队员协助搬运。部分降落地点较远的武器，即于事后另派战士跋涉寻觅，作散失处理。

联军飞机在华玲北部山区，从2月底到8月初，前后空投4次，其中投给抗日军的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只有两次。有适合在热带森林作战的卡宾枪、斯汀枪（轻型手提机关枪）、轻机枪、航空曲尺、左轮、几支无声手枪、18毫米口径轻型平射炮，两门掷弹筒，以及手榴弹、子弹、炸药、匕首等等武器；军毡、长统帆布胶鞋，贝雷帽、防水布席（可当防雨披风），帐篷、背包、腰带、子弹袋、草绿色和黄色军服，以及救急包，消毒片（随身福尔马林）、药管等等药品；果干、

饼干、羊油膏、糖、酒、香烟、盐、肉干及罐头食品等等。品种虽多，数量较少。

吉东和吉北人民抗日部队长期保持密切联系。5月下旬，联络官通知吉东部队，东南亚联军总部将从印度派出飞机，直接对吉北部队投放联络人员和武器物资。陈鲁等领导人就扩军，空投注意事项，对待联络人员的原则和今后战斗部署等问题，写出密函，遣派卫忠和坤山，由山路送往纯笃大港尾。会讲几句日语的卫忠，化装为日本军官，坤山扮成卫兵，途经马来农村时，都是招摇挺胸而过。途中经过3个交通站，都由交通人员指带。日夜兼程，两天一夜才抵达大港尾，将密函当面交给党代表陈古。

联军总部迟到1945年5月底，才向吉北人民抗日军基地空投联络人员，续后空投一次武器装备、弹药和其他用品、物资。空降地点在大港尾谷地沙坝（采矿余泥沙滩上），空降场地在三堆烟火中央加铺一块4平方米的白布。空投武器品种比吉东部队少，没有掷弹筒、小口径轻型平射炮和无声手枪，航空曲尺和左轮手枪也很少。空投物资部分飘落在荒山深谷森林中，始终无法找到。空降联络官也不顺利，一个联络官被参天大树梢挂住降落伞，无法脱身，吊在高空摇曳，大概是神经太过紧张，英籍联络官一边望下叫喊，一边从衣袋中掏出酒瓶喝酒压惊。显然，远投敌后山林的任务，并不是出自本人的意愿。最后，由身轻如猿胆大心细的抗日战士赖彪、冒险爬上离地约20米高的大树旁枝，将联络官接放下地。空降北吉打的联络人员5人，其中联络官3人（英籍2人，法籍1人），华人翻译员及无线电报务员各1人。

以英军为主体的东南亚联军总部，空投武器给马来亚共

产党领导下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既想加以利用，又存有重大疑虑和忌讳，怀着复杂的矛盾心理，既对马共《抗日九大纲领》第一条“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耿耿于怀，认为将是恢复英帝对马来亚殖民统治的严重障碍，又认识到几万马来亚抗日军民配合反攻马来亚的重要战略价值。因此，1943年杪的协议当中避而不谈马来亚战后的政治地位。空投武器也作别有用心的安排：大部分都是陈旧的次品；子弹盒很少，每支卡宾枪只配两个后备子弹盒（英美士兵配备4—6个）；10支斯汀枪（手提冲锋枪）当中，8支未打完连发的一梭子弹就被卡住；航空曲尺弹簧松弛，佩在腰间跑几步顿几顿，子弹盒就会脱出，等等。吉打人民抗日军在严峻事实面前，不能不作必要的思想准备。

联络官当中，不少人对有色民族的人民抗日军怀着顽固的蔑视和敌意。希士乐拒不执行联总关于协助抗日军进行军事训练的指令，故意多方延宕训练计划，始终不实施，华人联络员干焦急也没用，及至后来空降一名老少校来执行训练计划时，日本已宣布投降。希士乐“摆出殖民地主子的咀脸”，还作茧自缚，不愿与抗日军来往。联络员张朝国在战后说：希士乐主观、暴躁，心胸极狭，不信任华人联络组员，怕和抗日军接近，所住营房，除交通员外，不准任何人进去。希士乐的思想行为，是部分英帝联络官的典型代表人物，不是个别事例。1945年5月6日，在霹雳与吉兰丹毗邻地区降落的英人军官粗鲁、骄傲、蔑视抗盟人员和抗日群众，自我孤立，直至日本投降还滞留在山中，未能联系到抗日军。

一三六部队自1943年5月至1945年9月1日，乘坐潜水艇在马来亚西海岸（在东海岸一次）登陆及空降各州山区

的人员，总数 137 人，其中英美澳法军官、军医 90 余人，华人翻译、电讯员 49 人，霹雳州次数及人数最多，彭亨州最少，这和东南亚联军计划反攻重点的选择有关（日军布防重点在雪兰莪中南部西海岸）。空降到吉东和吉北的一三六部队，在沟通联军东南亚总部与吉打人民抗日军的联系，协助空降作战武器和物资方面，发挥了积极有益的纽带作用；同时也向联总提供不少敌情、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动态的情报，为反攻马来亚准备工作作出一定的贡献。

龙队成员（华人），大多数对人民抗日军态度友好，赞扬抗日军是“中华优秀儿女，不求私利，斗志饱满，一心只为抗日”。他们不为“狂妄、骄傲、态度刻薄、充满民族优越感”的英国联络官所信任，而是受到轻视、歧视。不仅生活待遇不公平，苦差都派华人队员承担，备用金（金块）特别少，不给知晓军事机密，不配给地图、指南针。龙队成员在战后公开评议：“为了配合联军反法西斯战争而投身异域，准备探虎穴固然神圣，可是实质上总不外是为英帝国收复马来亚的战争，为帝国主义重新奴役殖民地人民效命”。

吉北和吉东人民抗日部队在得到联军武器供应以后，大批后备队员，自卫队员调上武装部队，部队原用来福枪、三八式步枪、猎枪，则下放给农村的后备队和自卫队，增强部队和农村抗日群众的作战实力。基地和游击区群众武装都加强军事训练，抗日同盟会组织和民运工作都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吉北部队主动进击康月火车站和昔罗日军据点。吉东部队派出小队在高乌通华玲公路和华玲通古邦（Kupang）公路上，分别伏击日军运输汽车。

7 月，一小队军装齐整，配备卡宾枪和斯汀枪的抗日军，

由山路西行，进攻武吉茹嫩警察所。事先的侦察工作，有意由小队自己派人到茹嫩与当地抗盟取得联系，由陈德俊等协助调查警察所的情况，而后研究作战方案和几种可能反应的对策。晚上，没有星光，小队分为两个战斗组，一组直冲警察所大门，一组从旁边窗户进入室内，结果，战斗相当顺利，已经丧失斗志的马来警察全部举手投降，毫无抵抗。抗日军只将一个敲许勒索群众，罪恶显著的马来警察亚利拉出公路枪毙，对其他5名警察只予宣传教育，说明人民抗日军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日本侵略者的道理，与日军狼狈为奸，残害人民的走狗，必将得到亚利同样的下场。不给任何惩罚，并将步枪付还警察（卸下撞针、丢弃所旁）。这是准备配合联军反攻，将部分小队分散袭击骚扰日军交通与后勤的演习。事后，群众说：“武吉茹嫩警察，领泰政府工资，帮抗日军看门”。

此后，武装配备齐全，军服齐整的抗日军小队或分队，以三星红旗前导，在华人和马来人农村中行进，各族群众很多围观鼓掌，军民感情进一步融洽。一般线人在抗日军经常经过的农村中销声匿迹。大反攻前抗日游击区的范围已从农村逐渐扩大到乡镇。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马共吉打州特委及续后的特别支部，以主要力量紧抓抗日武装斗争的组织领导，另一手紧抓人民抗日同盟会和统一战线的工作，利用矛盾，掌握机遇，争取多助，支持抗日武装斗争。统战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侵略军对吉玻两州的统治机能。吉打人民抗日斗争核心组织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不但蹂躏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地，残害亿万无辜人民，到处掠夺抢劫，极其野蛮凶残地烧杀破坏，造成约 4500 万人的死伤，财产物资损失约近万亿美元（1937 年比值计算），人民遭受空前广泛深重苦难。对待日本国内人民，也是不断加深剥削压迫，搜刮炮灰，造成骨肉离散死亡，生活贫困。因此，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受到被侵略人民的刻骨仇恨，坚决抵抗，同时引起国内部分人民的愤懑与反对。被侵略国家和地区的各阶层少数为日本侵略军服务、合作的人，其中部分是被迫的或敷衍应付的，部分是看风驶舵的，死心塌地替日军效力、卖命的鹰爪狗腿，只占少数。在宏观战略中被侵略人民中的犹豫分子，侵略者国内反对侵略的人民，以及侵略集团当中的消极分子，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争取对象。

针对日本统治下的华侨资本家，多数人软弱怕事，逆来顺受，违心听任日本侵略者驱使，又怀有潜在的民族受难意识，不满经济权益受到剥夺侵害，不满亲友受到迫害的特点。在各中小城镇中（吉玻两州没有人口超过 10 万人的大城市），

部分抗盟派人打入由马来军政当局迫令成立的治安维持会，华侨协会（居林只有治安维持会，没有华侨协会），或对维持会、协会的头面人物，因人而异，保持不同距离的联系，从中施加影响，让他们暗地里为抗日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潜默作些经济或粮食、药物支援，或对日本军政当局粉饰太平，迷惑麻痹敌人，掩护抗日活动。纯笃姓傅的治安维持会会长，由陈古亲自联系教育，始终不向章仑警备队反映眼皮底下的抗日活动情况，不干预撤派抗日传单等活动，自己还交纳抗日同情捐。假子山姓王的维持会长，在抗盟劝导下，长期间向日军汇报“平安无事”，暗中则向抗日军报告各地日本军政动态。方壮志在主编《活路报》期间，经常住在方克明舅父黄文佑的家中，黄是武吉茹嫩的维持会会长，受到方等的教育，心甘情愿当壮志的庇护人。至于维持会管辖下的自警团，是18—45岁的青壮年男性居民，被迫于晚上手持木棍在街头巷尾轮流值班放哨。在别动队活动的地区，部分自警团员，实际上成为别动队的义务耳目岗哨，所见所闻，都以“闲谈”的形式告诉别动队员，这是抗盟搜集情报的一条可靠通道。

阿罗斯打华侨协会在1942年初成立，马共区委张牙依据马共党员伍仙护曾在协会会长钟文贤开办米较中任职的关系，劝说钟文贤将被宪兵部捕禁尚未暴露抗日身份的伍仙护及陈亚辉，作为“良民”担保出来，安置在协会中工作。在钟文贤、陈荣树支持下，利用协会名义，向日本宪兵部及警备队担保释放一些未被查明证据的抗日工作人员和秘密支持抗日的群众。钟对仙护讲过：“对被捕的人，没有查获证据的，能救的尽量救，能担保的尽量担保”。几个月间，利用协会会

所，临时收藏等待转发《活路报》；利用会长、副会长各自暗藏于米较谷堆中的短波收音机，收听各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在可靠华裔（协会会员）中秘密传播。双溪大年华侨协会会长郭六一，秘密捐助抗日经费，所办烟厂，作为抗日的交通站。加央、居林各地治安维持会、华侨协会负责人卢枢基、黄树邦等，都不同程度地秘密为抗日工作做了一些好事。

阿罗斯打警察总局刑事部的暗探林峇味等 10 人，由于地下抗日工作人员以“朋友”的身份，加以劝告和陈说利害关系，在 1942 年至 1943 年间，只抓流氓盗窃等刑事案件，长期没有抓到抗日分子，被日本警察局长罚款半个月工资，并禁闭半个月。华侨协会工作人员，争取到会长支持，用举办福利救济贫困的名义，向 10 家较大的米较、摊派募捐大米，从中分配给不愿与抗日分子为敌而受处分的暗探家属 10 袋大米（1 吨）和几十斤咸鱼，实际上产生无言慰问与鼓励作用。

1945 年 2 月，吉东人民抗日部队刘荣光，由各携一支手提机关枪的林春奇和林坤山护卫，踏着深沉夜色，到华玲镇郊外，找粮仓管理主任亚茶谈判，彼此都是潮汕人。最初要求亚茶捐助 5 大卡车大米给人民抗日军，亚茶吓得脸都苍白了。怕被日军杀头，还会连累妻女儿子，无论如何都不答应，彼此不欢而散。第二晚，3 人再找亚茶，晓以大义，并提出“从泰国勿洞运来大米，半路上被抗日军‘抢走’”的办法，用来瞒骗日军当局，亚茶方才打消顾虑，诚意答允了，于是订下时间地段，分头进行布置。刘荣光调派武装抗日军进行拦车和掩护，组织路段邻近山区农村缺少粮食的华人和马来人农民，分批分段，分开 3 次在 3 个不同路段上，将 5 大卡车

从勿洞（Betong）经高乌（Keroh）运往华玲的大米，拦截下来，农村华巫青壮年群众，一拥而上，顷刻间就搬光。大米分给山区农民。部队距离较远，而且邻近产粮平原，粮食并不匮乏。

3月间，吉东人民抗日军迅速发展，部队粮食需要量相应增加，队长老杨选派熟悉马来话的当地抗盟负责人陈海汀，到盛产稻米的牛英村，向马来村长做工作，要求捐助粮食。村长说明村里的老百姓拥护抗日，愿意动员村民捐助白米，但是近来有个名叫歪（Wai）的马来暗探，来自华玲，经常到牛英马来村敲诈勒索，各家喜庆酒筵一定要请他，否则就造事生非，兴风作浪，全村群众又恨又怕，无奈他何，此人不除，无人敢接济抗日军。双方经过研究，决定由村里放出大办喜事筵席的空气，引诱歪自投罗网。歪果然上当，届时蹬着自行车，兴致勃勃而来，走进别动队埋伏圈时，就被捉住，问清姓名无误，并从身上搜出警备队侦探证件，即时就地处决，埋于荒野灌木丛间。马来村民闻讯，无不欢天喜地，抚胸相庆。此后，牛英马来村农民，多数人经常捐助白米给人民抗日军，开始有些马来青年农民参加民运工作。勤劳良善的马来农民，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和人民抗日军的英勇斗争中，滋长出祖辈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强精神和引发日益浓厚的民族自主意识。

吉打人民抗日军对待吉玻地区以马来人为主的警察局（所）的态度和方法，和对待威利斯省的警察局（所）有所不同。吉玻地区的马来警察，较多受到抗日军和别动队大公无私、勇敢牺牲精神的感召，加以暗藏不满泰国统治的消极情绪，基本上抱着对抗日活动消极少理自保安全的态度，个别

的还暗中为抗日工作做些隐晦的好事。1942年年底，马共阿罗斯打个别区委，说服一个熟悉的监狱马来狱卒阿末(Ahmat)，将被捕关进监狱的马共党员的表现及其主要供词，暗中转告。阿末为人正直，富正义感，不满日军及其爪牙所为，答应照办，经过调查，及时将叛徒跛脚陈及许其臻等人叛变出卖的情况，秘密告知马共朋友。区委潜伏成员据此急速采取对策，组织撤退，减少部分损失。1943年底以后，纯笃警察所的马来警察，接受“朋友”的劝告，同时吸取前任警察被缴械的教训，长期间和镇上抗日分子相安无事，互不干扰。

1943年底，一个月落星稀的晚上，春奇、坤山等4个别动队员，为执行锄奸任务，步行走到古树灌木苍莽郁茂的华玲附近小路上。两个武装马来警察出外巡逻，乘坐自行车迎面冲来。别动队员以为遭遇到警备队暗探，黑暗中开了一枪，一个警察臀部受到轻伤，惊慌失措跌在地上；另一个警察掉转车头往后急跑。队员们跑前看清是马来警察，马上把他扶起，帮他包扎伤口，说明枪击是出于误会，讲清“抗日游击队只打日本侵略者和残害人民、破坏抗日的暗探和坏人，不打无罪行的警察”。把枪还给警察，让他乘自行车回华玲。被释放的警察回到华玲警察局，向警长详细会报肇事的经过和别动队的讲话。警长大受感动，从此就和华玲的抗日同盟会人员有了联系。1944年1月26日，500多名日本警备队士兵进攻日落湾山林中抗日游击队营地的紧急通知，就是这个警长通过华玲抗盟工作人员转告的。

1945年8月19日，阿罗斯打监狱狱长捷拉(Chelah)，经过人民抗日军代表说服并签名承担责任，将关押在狱中的抗

日政治犯及被日军滥捕的无辜群众 200 余人全部释放，捷拉则带领全家于同日逃回自己的乡下避匿，以防日军追究责任。这是刘荣光为提防日本驻军在正式缴械投降前，临死疯狂挣扎，藉故杀害狱中抗日份子，所以派遣与捷拉有交往的党员，说服捷拉擅自采取应急措施。日军在投降之后，部分军国主义死硬分子，企图继续负隅顽抗，或发泄兽性，残害人民。日军马来军区司令板垣大将曾经企图孤军抗拒联军登陆，经卧病的日本南方遣派军最高司令官寺内寿一元帅劝阻，才放弃蛮干设想。马六甲日本宪兵，于 9 月 5 日，英军已在新加坡登陆，还因不满宣传日本战败投降消息，而将人民委员会 9 名负责人集体刺杀。当时及时抢救被囚禁的抗日人员，是完全必要的。陈古即在阿罗斯打游艺场内群众欢迎大会上，宣布为一些坚持革命立场、坚贞不屈的被捕抗日战士恢复党籍。

统战工作还做到马来绿林好汉的身上，这个危险的工作，是由通晓马来话的马共党员阿珠单线进行的。阿罗斯打西面海边区（Alor Jangus）一座小山上，住着十来户马来人，白日是在山脚耕种的农民，晚上是外出做免本生意的好汉，对附近的华侨农民、居民和小商店威胁很大，但是未有伤害人身的行为。当地抗盟于 1944 年底布置阿珠进行联络说服工作，从交朋友入手，发展到推心置腹，谈心说理。阿珠终于争取为首的头目同意，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不伤害老百姓，有情况互相通气，有困难互相帮助解决。附近的华侨非常满意，对抗日工作信心倍增，先后鼓励自家的子弟 5 人参加吉北人民抗日军。

赖金锋在玻璃市北部山区，说服以马来青年弯庇（Wanpi）为首的马来武装小组，协议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由

他们向导，带领抗日军驱逐泰马边境山区一股华人强盗小集团。他们还在马来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鼓励马来农民支持人民抗日军，发挥抗盟的盟友作用。日本投降后，经弯庇介绍，玻璃市拉惹（Raja 土侯）满怀激情，紧握赖金锋双手，表示非常感激帮助他外甥走上正道，引导王室人员参加抗日活动，为王室增添光彩。

对日本军官和日本商人的统战工作，仅是个别的，而且很隐晦，实质上是利用其思想矛盾，因势利导，以减少对抗日工作的祸害。

阿罗斯打华侨协会每逢节日，都宴请日本军政要员、宪兵部、警备队的各级头子和主要日本商人，以表示响应日本马来军政监部“与当局协力同调”的要求，有利于掩护协会内部抗盟人员的抗日活动。几乎每次都看到名叫真锅武之的日本壮年商人，以酒消愁，醉不停杯，有时从衣袋中取出照片，边看边流泪。协会的抗盟人员终于弄清真锅武之原来是上海日本商人，有个漂亮的上海妻子和两个儿子，长久未能见面，音讯断绝，担心其生活和安全，所以愁眉难展。抗盟人员于是蓄意多接近他，1942年多次利用他带引协会人员向各地警备队担保释放一些无辜群众和个别尚未暴露身份的抗日工作人员，前后超过40人。其中黄玉钦、卢枢基、陈炳权、张茂树等原筹赈会担任主要职务的华侨资本家，被宪兵部指令保释后必须分别在双溪大年，加央等地成立华侨协会，陈炳权则在居林负责治安维持会。真锅武之于1944年乘船北归，中途被美国潜水艇击沉。侵略者创造条件，使自己玉石俱焚。

武吉茹嫩是个弹丸小镇，但因地处吉打中部铁路与公路

交叉点，又是控制东部山区的军事要点，常驻一个中队日本警备队，属鲤部队所辖，对抗日活动有较大威胁，该地区原是抗日别动队的重要据点之一。抗盟组织利用警备队长竹内德治郎的妻子是福建人的关系，通过当地治安维持会会长进行内外游说，让警备队将镇压矛头指向各族的强盗和流氓份子，两年多期间，只在茹嫩枪毙一个马来强盗，未有抗日份子在該区被捕牺牲。竹内德治郎中队后随鲤部队被调往新几内亚作战，结果全军覆没。

军事是政治的延长，吉打人民抗日武装与民间组织，充分认识到武装斗争及群众工作绝对不能脱离政治工作的全面配合。统一战线工作是政治工作重要的一环，重视统战工作，使吉玻两州的抗日工作增加大量的有利因素，减少不少阻力和损失，成为和武装斗争，群众工作互相辉映的抗日重要手段。

五、日本投降后 斗争正延伸

1945年初，吉打人民抗日部队积极扩充组织队伍，加强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苏联军队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重大胜利，标志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踏进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10月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并再次重创日本联合舰队，预示对马来亚的反攻已经逼近眉杪。联军东南亚总部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空投武器物资，加速了吉打人民抗日部队的发展壮大过程。人民抗日军尽力做好配合联军反攻马来亚，驱逐和消灭日本侵略军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日本侵略军陆军70%深陷中国人民坚决抗击的泥潭中，挣扎8年，已是遍体鳞伤。中途岛海战及所罗门海战以后，制海制空权全部丧失。1943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7月，联军飞机大规模轰炸日本各大城市，8月6日与9日美国先后在广岛及长崎投下原子弹，造成两座城市居民死亡23万人；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并进军中国东三省；中国军队发动全面大反攻，节节胜利。日本至此力尽气竭，严重窘迫，御前会议经过长时间剧烈争辩，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由日本天皇裕仁，在东京广播电台宣读《终战诏书》，接受中美英三国于7月26日公布的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美舰米苏里号(Missouri)上签订降书，由联军最高统帅麦克亚瑟

(Mac Arthur) 接受降书。9月12日，日本马来军区板垣大将代表病重的南方军总司令寺田寿一元帅，在新加坡市政厅大厦，向联军东南亚区统帅蒙巴顿海军上将 (Mountbatten) 签署降书。同日，在吉打州双溪大年飞机场，日军驻军代表向联军代表举行缴械仪式。先是两个日军少将跑步到受降台前，敬礼后，解下腰间指挥刀，双手捧置草地上，再敬礼后转身往后跑步离开。第二批是5个佐（校）级军官，第三批是10几个尉级军官，按照首批方式缴交指挥刀。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原吉打人民抗日军）司令员何小力在台上就坐，第二中队长带领10个小队长在受降台右边列队，华侨抗日军也有一个小队参加受降仪式。

形势的突然转变，使人民抗日军面临新的紧急任务，维护吉玻两州与威省的城乡治安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争取各民族人民的民主自由，成为当时迫切的战斗使命。

（一）胜利余波

北吉打和东吉打的人民抗日军，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就派出先遣部队下山，准备安排大部队的农村驻扎住所，并布置人民抗日同盟会分头到各城镇传达抗日胜利消息，发动群众，公开恢复工农青妇社团组织，准备迎接人民抗日军进驻。18日，武装部队全部整队开拔出丛山密林营地，分别

驻扎在纯笃和万那巴鲁村。各城镇人民团体，在各该地马共支部或抗盟领导下，纷纷在原抗盟组织基础上，分别挂牌成立工会、农会、青年团、妇女会、校友会、商会，选派代表或通过抗盟，要求人民抗日军进驻维持治安。在抗日部队进驻前，抗盟已经布署抗日后备队、自卫队，并在少数别动队支持下，组成治安巡逻队，带上红袖章，流动巡逻，监督市场、防止趁机哄抬物价。

8月16日及18日，吉南拉务勿杀抗日后备队，连续接到吉打人民抗日军吉东部队的通知：“日本已经投降，应即做好接收与接管的准备工作”。20日两个小队抗日军到达拉务勿杀，受到各族群众热烈欢迎，在后备队配合下，先后收缴拉务勿杀和加拉岸的警察所枪械，他们曾经协助日军搜捕抗日分子。继由温祥、李汉带领两个小队于23日到三巴央，又到爪夷、大山脚、高巴三万参加各界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收缴除北海和大山脚以外各地警察所（局）枪械，这些警察所（局）以前积极配合警备队围攻追捕抗日游击队。

几个大城市的日军，初期极力封锁日本投降的消息。檳城的华侨，在大街上互相传播日本投降的喜讯，不少人还被宪兵逮捕拘留，迟至8月20日，《彼南日报》才无可奈何公布投降的“迟到”消息，居民才被准许悬挂中国国旗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三星红旗。日军的少部分中下级军官，显然怀着不服气的心情。驻防阿那武吉的日军。受过吉北抗日军数次进攻、偷袭和反击，竟公然在公路上阻挠抗日军汽车的通行，受警告后才缩回营地。大部分日军警备队，接到马来军区逐级下达投降通知及联军命令，都在营房内不外出，等候联军缴械处理。

8月17日，吉东抗日军指挥部接到情报，华玲日军要运武器去双溪大年，准备集中保管，以便日后统一交给英军收缴。指挥部立即派遣陈斌、亚东、亚南率领3个小队战士，赶到布莱（Pulai）和古邦间山区公路上埋伏，准备截取日军运送武器，埋伏3天，不见踪影。陈斌奉命带队往拉务勿杀、亚东、亚南带队返万那巴鲁参加整编。

华玲警备队在日本投降后10天，全中队沿公路往西走动，意向不明。刚从拉务勿杀调回陈斌、李坚带领的两个小队人民抗日军，途经附近，听到情报，立即占领公路旁侧高地，埋伏等待、实弹准备。及至日本行进包围圈，经过喊话，立即停止前进。由翻译传话，弄清楚日军是野外集体游览，并无他意。抗日军派出李坚走前谈判，日军交出12支三八式步枪，双方各自撤回。

9月初，原驻吉打中部、南部的日军，前后几批共200余人，怀着对英帝国主义的仇恨心里，表示愿意向人民抗日军投诚。由于缺乏信任基础，都加婉拒，不予收容，只接收一些武器。

紧接着，仁岭板厂日本经理（少佐军衔，原用华名温和记），主动将所用日本曲尺和板厂的奥斯汀汽车送交给人民抗日军，他的华人妻子和男女小孩各一人留居板厂。经过一星期观察，抗日军分配给他一支航空曲尺，以表示对他信任。日本经理由此深感人民抗日军很讲信义，彼此都有强烈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共识，于是串连了另外12名日本军官和士兵，携械投向人民抗日军。他们就是不愿向英帝国主义军队投降。他们当中有少佐、军医、机械师、工兵、汽车司机和士兵，立即改用华人化名，依次是金枝、贵龙、清德、红星、荣光和

红光（会讲闽南话和普通话，当过汽车司机）。最初由张云、彭汉强、长宏等先后接待，全部化装成农民，和武吉茹嫩地区潮州菜农同吃同劳动，种过蔬菜、烟叶，两年后由卢能等带领转移到吉北纯笃地区，当过矿工，含辛茹苦，坚持不向英国当局投降，并为马来亚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注④）。

人民抗日军在各族人民当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当时控制着吉玻和威省的形势。8月20日开始，先后在阿罗斯打、双溪大年、居林、加央、大山脚、华玲等地，成立人民抗日军办事处，分别由黄志成、张牙、李坚、毛强（后换强华）、李汉、李群、陈斌等分别担任办事处主任，后略有调动。大山脚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驻威省办事处，除主任李汉外，党支部书记李坚，秘书组长郭华，肃特除奸兼治安组长林牧，工青妇工作组长胡克、张小秋。其他办事处的组织大体类似，干部多从抗日军和抗盟骨干中调任。陶小梅原是部队政工干部，后搞抗盟，独立队的公开编制中不设政工干部、被调居林办事处。办事处分别在吉北和吉东抗日部队领导下工作，作为抗日军联系群众的纽带，办理和日本驻军交涉事务，支持人民自治会工作，支持各地职工成立各业联合会（张云任吉打州职工联合总会主席）、农民联合会（主席赖金锋），妇女联合会（阿罗斯打、双溪大年、居林妇联主席分别为伍仙爱、陈励和梁良）和校友会等进步青年组织。12月1日成立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吉打州团，首任秘书张景章原负责区抗盟主任。随着政治路线的改变，大批抗日部队和抗盟的干部先后转移到群众团体中负责主要职务。

各地人民抗日军办事处，指令各地警察局，并和各地宪兵部及警备队严正交涉，立即释放在押未判刑的政治犯人和

无事群众 50 余人。办事处又派员向警备队交涉，要他们向人民抗日军缴械，由于日本南方军总司令部得到东南亚联军总部的命令，全部日军维持现状，等待联军受降缴械，所以不肯向抗日军交出武器。华玲、居林、日德拉、加央、双溪大年各地警备队，只是分别交出一些军刀、军用物资、军靴、汽油、汽车、粮食和少量步枪、手枪给人民抗日军。粮食、食品绝大部分转发给烈士亲属及贫困的群众。陈鲁、小秋（庄健英）及亚洲、张立等共 6 人，于 9 月初乘汽车到瓜拉吉底（Kuala Ketil）日本警备队营房，陈鲁用英语通话，向日军中队长提出要由人民抗日军收缴武器，警备队长推说没有上级命令，顽拒不交。经过严肃说理斗争，日军最后才交出长、短枪和子弹、手榴弹合计 10 箱。

8 月下旬，吉打人民抗日军派出一个小队武装战士进驻檳城，协助维护当地治安，并成立抗日军办事处，9 月 3 日联军先遣部队在檳城登陆后，就撤回双溪大年驻地。

同时，由蔡振华率领吉东抗日军许明耀等两个小队全副武装的战士，乘坐收缴的货运汽车，从华玲东行到高乌，再步行 15 公里到仁丹接管日本锡矿场交付当地抗盟处理，没有遇到日人武力抗拒。当时接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第三十五中队的邀请，随即乘车往南急驶 20 多公里，赶到宜力，原想参加当地群众庆祝抗日胜利大会。行进到宜力镇北郊，却被长期盘据宜力一带地域的 30 多名华侨抗日军，远远大声喝住，不许人民抗日军进入该镇。五独与吉打的抗日战士 50 多名立即占据镇外山丘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镇上华抗军摆成散兵式，埋伏在树柱各种掩体后面，带队头目继续大声喊叫：“回去！回去！不许进来！”距离百米左右，彼此都

以枪口相向，气氛非常紧张，坚持半小时，无法打开僵局。最后由第三十五中队代中队长，双手紧握两颗手榴弹，由两名战士分开两旁紧握上着刺刀的步枪护卫，挺身下坡健步走向华侨抗日军。华抗军尽管大声吆喝，但慑于人民抗日军气势勇猛坚定，占据有利地形，装备大部齐整（第三十五中队尚未装配美式装备），实力强大，始终不敢开枪。通过面对面对谈判，华抗军撤出宜力镇，人民抗日军整队开入镇内，参加群众大会，军民共庆抗日胜利。会后，第三十五中队战士表演军事操练和刺刀劈刺、动作熟练利落，军民尽欢而散（注⑤）。吉打两个小队，事后撤回古邦。吉东人民抗日军还先后派出两个小队，到高乌、仁丹参加群众庆祝抗日胜利大会，并短时间进行巡逻，协助当地抗日组织维持治安秩序。

（二）人民委员会

吉打人民抗日军吉北和吉东部队，分别暂时进驻纯笃和万那巴鲁时，吉玻各主要城镇，已在恢复与组建工农青妇学商社团的基础上，民主推选成立人民自治会，以后与全马各州统一口径，改名人民委员会。檳城与威省大山脚、高渊、北海各地，稍后才成立。人员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工农青妇学商各界代表和少数马来族冬姑（王族）、医生、教师及印度国大党的代表。华人头面人物大多是为人民和抗日做过好事的各该地侨领，如阿罗斯打的钟文贤、陈荣树、骆清河，双溪

大年的郭六一，加央的黄树邦，牛仑的刘东玉，武吉茹嫩的黄天佑，等等，居林则是马共党员李群。工作人员大都是抗盟骨干或马共党员，如阿罗斯打人民自治会总务（兼管治安）伍仙护、中英文秘书蒋成发、林风。阿罗斯打人民自治会，由人民抗日军领导人陈古主持成立大会，宣布组织办法，基本任务，被选人员条件等，然后民主选举产生自治会主任及委员，除钟、陈、骆及冬姑外，中选委员尚有爱国教师李维纲、张景章、伍仙爱、陈天华、朱丁、沈星云（原怡保日报主笔）和金惠余、王淮东、伍仙护等，抗日知识分子占较大比重。人委会先是接管华侨协会，在其旧址办公，行使基层人民政权的部分职权。

人委会首先抓好治安工作，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人民安全。在人民抗日军尚未进驻以前，主要依靠抗盟属下自卫队或抗日军后备队，并组织工人纠察队协助巡逻。考虑到维持社会治安的需要，对吉玻各地的警察局（所），没有破坏抗日活动罪行的，一般不予收缴武器弹药，责令守驻警察局所之内，听候人委会调遣，必要时才受调出外协助维持治安。在人民抗日军进驻各县镇以后，由抗日军巡逻街市郊区，治安秩序，有条不紊，基本上没有发现抢劫盗窃案件。个别小地方，如吉打中西部的马目（Merbok），发生过盗窃与流氓小案，人民抗日军及时派出小队暂时进驻以后，就安定下来了。

在维持市场物价稳定方面，人委会发动工人纠察队，分头检察监督，重点是食品、副食品，一般商贩都能保持价格稳定。人委会取缔日治时期各种组合等垄断组织，各民族农民的农产品，直接进入市场，和消费者见面，副食品价格维持不变，由于取缔组合的居间剥削，各族农民普遍增加收入。

在日本马来军政监部示意下，一些日本株式会社将库存物资低价抛售，收回毫无保证金的军用纸币（因有香蕉树图案，群众叫它“香蕉票”），用意是利用必将被没收的物资，减少日后可能承担的经济（通货）赔偿。一些日人家庭也低价出售不可能继续占有的家俱，短时间内，购买力已很贫弱的社会市场，生活物资物价得以保持稳定不波动。

人委会组织工作人员，没收接管被日本垄断资本（绝大部分是株式会社）掠夺霸占的米较、板厂、胶园、矿场、汽车、印刷厂等产业，归还原主；没收汽油等军需物资，则部分供应抗日军。阿罗斯打与双溪大年人委会，特别重视恢复交通运输营运业务，古邦巴素双溪大年等汽车运输公司，在人委会支持下，9月上旬就恢复开办旅客及货运营运，为城乡交通和物资交流服务。日德拉、华玲等县镇人委会通过谈判，将日军站哨守卫的仓库内大量存储白米，分发给当地各民族贫困居民；利用日资企业的部分库存生活必需品，救济受害群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

各地人委会，会同人民抗日军办事处，责令警备队派出知情士兵，带领各抗日和群众团体代表，到1942年被杀害无辜人民的集体乱葬野冢，发挖尸骸，让受害者亲属认领。双溪大年“老卜间”、双溪牙兰、居林等等地区，挖出尸骸，肌肉全部腐烂，只能通过所带首饰、手表、身上锁匙、小刀、钢笔等遗物辨认。

各县镇各民族人民，以人委会为首，联合各民族群众团体，在8月下旬，先后召开庆祝抗日胜利大会，邀请人民抗日军派出武装分队、小队或代表参加大会，群众情绪激动，气氛热烈。多数城镇在闹市中搭建庆祝牌楼，悬挂中国国旗和

抗日军三星红旗。用人委会牵头的各种宣传品，以及标语、漫画，小字报贴满街道和公共场所。歌咏队、话剧团非常活跃，充分表达出各界人民的喜悦兴奋心情。

人委会号召和支持各民族中、小学校、一律废除日文课程，恢复使用民族母语作为教学媒介，继续上课。被日本统治者迫令取缔的绝大部分华文中小学校 40 多间，以进步教师们为骨干，开始筹备开学复课。

抗日军办事处和人民委员会，普遍收到日治时期被杀害群众和烈士家属的控告信。有些是到办事处哭诉控告，纷纷强烈要求人委会和抗日军申冤雪恨，严惩凶手恶棍，为无辜被害亲人或朋友讨回血债。同时提供日本宪兵部与警备队暗探线人爪牙和叛徒等民族败类的行踪和近况。群众很清楚，这些恶棍凶徒，日后必将重新成为英帝国主义统治欺压残害人民的工具，所以非常强烈要求人民抗日军早日加以逮捕惩办，毋使漏网，贻害后人。吉打、玻璃市、檳城、威省各地受控告的罪恶昭著的叛徒、暗探 120 多人。牵涉到血债的重大案件，人民委员会经过初步调查核实，即将被害人家属的控告书或口述记录，转送人民抗日军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处理。由抗日军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临时军事法庭，经过反复审问核对和慎重研究，一部分不属主凶罪犯，经教育警告后，由其亲属担保释放。罪恶昭著民愤极大血债累累的叛徒，暗探凶手，即分别在拉务勿杀、牛场、新路、高岭等等地区，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控诉，宣布罪行，而后押往山林中处决。

由于马来亚共产党在内奸、特务莱特的操纵与欺骗下，于 1945 年 8 月 25 日召开中北马党军会议，通过右倾的《八大主张》（注⑥），以代替《抗日九大纲领》，将人民抗日胜利果实，

拱手端送给英帝国主义，承认英帝恢复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9月3日，英军先遣部队在檳城登陆；9月5日，英帝第十五军在新加坡登陆；9月9日，第三十四军在马来亚西海岸雪兰莪州摩立（Morib）登陆，往东北直插吉隆坡。至此，全部占领北、南、中3个战略据点，控制了全马局势。9月15日，建立以霍恩爵士（Sir Herbert Ralph Hone）为民政长官的军事管制政府，实行军政统治。9月下旬，在各州强制撤销各地人民委员会，吉打、玻璃市各地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机构，至此被迫宣告解散。

各地人民抗日同盟会继续进行活动，配合各民主团体，扩大宣传、鼓励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和自治而坚持斗争。在没有成立人民抗日军办事处的县镇、继续发挥联系人民抗日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作用。后期各地抗盟主任、阿罗斯打张景章、加央安能、双溪大年庄小秋，居林李群。直至人民抗日军复员时，才和抗日军办事处一齐结束业务，停止活动。

日本投降后半个月，马来亚共产党就在各州先后成立办事处，以加强和各族人民的联系。驻阿罗斯打的马共吉打州办事处，主任陈德，后由李红（周南星）继任。马共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仍处于地下秘密状态。1946年5、6月间，各州马共办事处撤销，只保留吉隆坡和新加坡两个办事处。

(三) 针锋相对

东南亚联军总部在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于命令日本南方军司令部，全部日军维持现状，就地驻营，保存武器装备，等待联军接受投降的同时，又指令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军事委员会（由莱特化名张红，加上陈平、刘尧 3 人临时组成）：人民抗日军不要进驻城镇，留在原驻地，静待联军回马后安排处置。英帝居心非常明显，梦想隔绝人民抗日军和城镇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以免妨碍英帝恢复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

吉打人民抗日军对此无理要求，当然和全马各独立队一样，置之不理。

吉东和吉北抗日军部队于 8 月 16 日就派遣先行分队下山，3 天内全部撤离山林营地，开进平原乡镇，不顾联络官的反对、阻挠，分别派出全副武装的小队或分队（辖三个小队，编制如排），先后进驻各城镇或流动巡逻，维持治安，支持成立人民委员会和群众组织开展民主活动。每名战士随身带足 150 颗子弹（卡宾枪）或 200 颗子弹（斯汀枪），两颗手榴弹，随时准备应付各种意外事变。联络官对此很感不满，但是无可奈何，只好旁观摇头。

8 月 21 日，马共吉打特别支部陈鲁、陈古、张云 3 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执行《抗日九大纲领》所订路线，保卫人民抗日胜利果实，反对英帝恢复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将吉

打人民抗日军改名吉打人民解放军，同时举起“吉打人民解放军”的红旗，左上角还是三颗黄星。吉北部队整编后，由纯笃开出，进驻高岭。吉东部队整编后由万那村开往古邦，9月初再移驻居林北郊老火较（Kelang Lama）马来学校。

吉北和吉东人民抗日军的联络官，跟随抗日军部队离开山林营地，他们首先集中到双溪大年，并向东南亚联军总部汇报吉打人民抗日军动态及更改旗号为人民解放军的过程。9月10日，英军第三十四军进驻吉隆坡之后，认为“抗日军”改名“解放军”，意味着将斗争矛头从日军转向英军。立即向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警告，不承认吉打人民解放军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组成部分，不符合一三六部队与马共、人民抗日军、抗盟代表于1943年年杪所签订协议的范围，应该加以解散。当时莱特已经重新投靠英帝，暗中接受英帝的安排，极力主张停止人民抗日军为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当然不能允许武力抵抗英帝恢复殖民统治的行动。马共中央军委马上派出陈平，到吉打双溪大年，向陈鲁传达军委的命令，将吉打人民解放军改编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由于马共吉打特别支部尚抱观望态度，还未采取反抗英军的具体行动（未向战士传达，未向群众宣传），尚无外界影响，所以得以顺利解决。调派原第五独立队司令部政治委员何小力（何添信、肖力）任第八独立队司令员，另调第五独立队两个中队长张江海（江雁）、白丝木任副司令员。陈鲁、陈古、老杨、刘荣光、张云等原部队主要领导人，和张田、温祥、志业、陈春梅、李群、庄小秋，黄志成、张牙、李坚、彭汉强、林春奇、林坤山、赖金锋等等20几个抗日骨干分子同时调离武装部队，部分在各地区分别担任马共组织和群众团

体的领导职务，部分转入秘密部队，在不同岗位上，坚持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争取民主自由和自治，反对殖民统治。

第八独立队司令部最初设在居林老火较，队伍改编后移往双溪大年，和印军团部距离不远。白丝木留在居林，领导原吉东部队改编的第一第二中队。

第一中队中队长陈忠、副中队长陈斌、阿添、肖坚。9月中旬全中队调驻双溪大年，和司令部同住一起。先后派出小队分驻牛仑、茹嫩、美农、仁岭、班茶、马目各地，流动巡逻，维持治安。

第二中队中队长文训（林一叶）、副中队长长宏、国联、蔡忠。中队部继续留驻居林老火较。由国联带领两个小队分驻靠近威省的孺乃（Lunas），另几个小队在居林附近市镇巡逻。部队并不直接和群众团体联系，一般通过人民抗日军办事处互通信息，根据个别地区的要求，派出武装小队进驻或巡逻。

张江海驻在加央，领导原吉北部队改编的第三、第四中队。

第三中队中队长戴翔，副中队长杨剑秋、马龙、文山（后调职）。中队部驻加央，派4个小队分驻亚娄，另派小队驻防加基武吉、新路，不时流动巡逻各地。

第四中队中队长西风，副中队长巫阿友、直民。中队部驻在日德拉，曾由阿友带领3个小队分驻章仑，也派小队巡逻纯笃各地。

第八独立队经过整编调整后，编制全部统一。每个中队（相当于连队）下辖3个分队，分队长都由副中队长兼任；每个分队下辖3个小队；中队部直辖1个小队，负责警卫、通

信、后勤工作。独立队司令员 1 人，副司令员 2 人；司令员配备警卫员两人，汽车司机 1 人，副司令员配备警卫员各 1 人，汽车司机各 1 人。每个中队各配备卫生员 2 人（温月娇、谢素贞、蔡小芳、瑞华、马凤、九妹、叶英、温英；山林中卫生员吴亚花被调移，郭金枝提前复员）。独立队没有党代表和政治委员编制，中队不设指导员，由中队长安排政治学习，兼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一个副中队长兼管军需、生活，炊事员由战士轮流担任。全独立队在编指战员 513 人：其中 8 个卫生员是女性华侨青年，其他 505 人是男性华侨青壮年。

各中队都有英籍军官 1 人为联络官，另 1 名华人翻译员。第一中队联系官少校军衔，其他中队是上尉，司令部联络官是中校军衔。联络官与翻译员和人民抗日军同居一个营地，但另住一幢设备良好的房子。名曰联络，实是监视。联络官曾经分别向各中队中队长提出试探性无理要求，争取同意执行英国驻军的有关指令，结果受到义正词严的拒绝：“人民抗日军指战员，只能接受人民抗日军直属上级的命令”。日本投降前，1945 年 4 月 18 日，马共与联军代表再次在霹雳州美罗山会议时，联军代表就曾经提出要求霹雳州一带的人民抗日军，归由联军东南亚司令部指挥，当然遭到断然拒绝。两次会议的要求，具体动机虽然不同，但企图在坚如磐石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当中，打进楔子，加以分化利用的实质，即是一致的。

在第八独立队各中队，分队及外派小队驻地附近，都驻扎人数几倍的英印军队进行威慑性监视，形成严峻局势，似乎比较其他独立队的处境更加苛刻，可能和曾经改换人民解放军的旗号有关。各中队对此恶意挑衅，以加强军事操练，有

时在半夜紧急集合训练作答复。第二中队比较严格整肃，被评为模范中队。

9月初，一个分队全副武装的人民抗日军，应邀乘坐二辆大卡车，从居林老火较到双溪大年参加各界群众庆祝抗日胜利大会，途中受到乘坐轿车迎面来自双溪大年的英国联络官阻挠，挡住去路，大声喝斥：“谁叫你们去”！领队的中队长跳下车来大声叱喊：“人民！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走开”！二中小队长陈祝等几个战士持枪跳下车来，怒目而视，联络官不得不灰溜溜走开。

10月中旬，驻扎孺乃的英军连队（英籍军官，印籍士兵），有意制造事端，以探测人民抗日军态度，在巡逻途中，故意收缴一个单身外出抗日军战士的随身枪械。中队长亲往英军营中提出严正抗议，英籍连长推说是为了检查其身份是否合法。中队长立即郑重警告：人民抗日军今后将在途中将“可疑”印军缴械，以便审查其身份！英籍连长方才表示歉意，交还武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此次冲突反而教育了印籍士兵，有个印军事后偷偷告诉人民抗日军战士：“每个印度兵身上只有3颗子弹，英国人不信任我们，我们羡慕你们”。印度人民正在争取印度独立，所以英国殖民者在使用印度士兵时，无时无刻都是提心吊胆，提防印军兵变。

马来亚的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大量收容雇用原日本宪兵部和警备队的暗探，利用他们熟悉镇压欺凌人民的伎俩，以打击人民争取民主自由运动。一部分效忠日军的败类，重新作威作福，欺压群众，在人民抗日军还没有复员以前，就在吉打、檳城大庭广众之间，殴打侮辱抗日工作人员。檳城阿逸衣淡的恶棍暗探大头成，带着几个暗探光天化日在闹市中

狼突蟹行，横冲直撞，调嬉妇女，吃霸王饭。经组织决定，人民抗日军驻槟城别动队员林春奇、林坤山，在当地一名别动队员带领和掩护下，9月底尾随大头成到游艺场大门口，从后开枪击毙大头成，掩护队员吹响哨子，跟随大头成的4个暗探狼狈奔跑，鸡飞狗散。原双溪大年宪兵部暗探钟成，双手沾满抗日烈士和无辜群众的鲜血，日本投降初期，逃脱抗日军的追捕，英军回归后，投靠日治前的老主子，竟带两个暗探，在阿罗斯打大街上殴打前抗盟干部。1945年底，钟成和几个暗探，在富士旅馆楼上开3桌打麻将，从牛仑受命而来的神枪手张潮，态度悠闲，登梯上楼，对准钟成额部开了一枪，钟即倒毙楼板上，其他暗探木然不敢动弹，张潮从容乘坐单车走出郊外。受此教训，吉玻暗探，气焰大为收敛。由于英帝利用大量日本暗探搜捕抗日别动队员，张田、奋光、温祥、张原、彭汉强、蔡育生、沈亚九（沈少峰）、朱纯德、温少山、陈毓光、黄亚立、蔡金水、黄玉灶、江湖、刘荣、小黄等等30几个勇敢、机警、沉着的别动队战士，不得不在英帝军警的鼻子下，和叛徒、特务、匪徒以及残害人民的右派私会党徒，继续进行短兵相接，辛苦艰险的坚决斗争。3—4人为一组，各组互不通气。

从日军投降之日起，英帝国主义就将马来亚共产党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当作潜在的主要敌手，步步设防，严密监视，多方限制，处处作梗。严酷现实，使第八独立队的人民抗日战士，思想上已经作好为维护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必须勇敢面对更加艰苦而长期斗争的准备。

(四) 开展和平民主斗争

英军重新占领新加坡和马来亚以后，9月15日，在东南亚联军司令蒙巴登直接领导下，成立马来亚军事管制政府（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简称BMA），分开管辖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民政，使新加坡成为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马来半岛则企图披上自治外衣的准殖民统治。军事管制政府一手抓经济掠夺，一手抓政治镇压。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火与战费严重破坏了曾经称雄世界的经济优势，丧失11亿英镑的国际投资，增添30亿英镑外债，全国财富损失大半，工农业生产萎缩衰退。首相丘吉尔的女儿结婚时，友人的礼品竟是红丝带盒子中装着两个鸡蛋。殖民官员们从马来亚邮寄英国亲属的包裹，多是白糖和鸡蛋。由此可以理解马来亚军事管制政府，严峻不人道的经济剥削政策，将战争损失大量转嫁到马来亚人民身上。

最大量而危害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最沉重的剥削，是英军在新加坡登陆后仅3天，于9月8日宣布无偿废除在3年8个月期间，流通量约70多亿元的日本军用票。马来亚与新加坡500多万人民，尤其是工农劳动群众，生活受到极大打击，小商小贩几乎血本无归。军管政府对此不作任何补助与救济。新发行的新加坡纸币约10亿元，比较日军强迫掠夺的5000万元奉纳金多出20倍。吉坡两州人民在人民委员会领导下，曾经在阿罗斯打举行抗议游行，派代表递请愿书，几个中小城镇也召开抗议集会，要求赔偿人民损失，发放救济

金，军管政府蛮然拒绝，置之不理。

紧跟英军返回马来亚的英国垄断资本牙得利公司（Guthrie Co）、莫实德公司（Boustead Co）、赛音达比公司（Sime Darby Co）等等财团，控制马来亚主要经济支柱橡胶的70%和锡业的60%，吉玻华人的橡胶、锡、钨、椰干、椰油、木材销售出口，全受它们控制。英国在马来亚独占本国剩余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穷困的英国在战后几年间，每年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转口贸易）榨取的外汇超过10亿新加坡元，超过英国本国及自治领所得，马来亚被称为大不列颠帝国的“美元奶牛”。英帝为此加强镇压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马来亚民主自由运动。军事管制当局，一方面继续大量发行通货，一方面大肆搜刮物资，加以管理无能，只剥削，少开源，造成物价高涨，黑市猖獗，军事管制政府（BMA）在吉打州被人民称为“黑市协会”（Black Market Association，简称BMA）。

军事管制政府政治上恢复殖民统治的手法，和在印度、缅甸及非洲英属殖民地的手法基本同样，一是制造民族矛盾，便于分而治之，二是制造民主假象，进行改良欺编；三是制造事端，实行血腥镇压。

英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重破坏，捉襟见肘，面对空前困难，更是念念不忘对弱小民族的残酷殖民统治与剥削。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透露，1943年1月14日美英法“安发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强调指出，战争的结束，将是被压迫国家解放时代的开始。听了美国总统这番话，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脸上显出局促不安厌烦恼怒的神色，因为英国根本无意让它的殖民地获得自由。英国殖民部在丘吉尔

继续维护殖民帝国梦想的指导下，同年就制订新加坡保持皇家殖民地地位，将马来亚置于英国控制下，实行有限内部自治的计划。

依据上述计划，1945年10月，派遣麦迈格爵士（Harold Macmichael），从18日至12月21日，巡回马来亚各地，用利诱加威胁手法。迫使吉打州苏丹、玻璃市州拉惹及霹雳、雪兰莪、柔佛等等7州苏丹签订条约，承认英皇对马来亚各州的统辖权。当局同时阴谋安排煽动怂恿少数马来民族极端分子，制造事端蒙骗部分马来群众，从吉打州开始，提出“马来人万岁！打倒中国人”！（Hidup Melayu Mati China）和“中国人走开”！（Chinese out）等排华口号，在吉打、霹雳、雪兰莪、森美兰、柔佛各州，挑拨煽动少数暴徒屠杀华人男女老幼，烧屋抢掠，破坏民族团结，方便英帝恢复殖民统治。马共阿罗斯打办事处代表李红、亲到华玲马来农村，说服村长，消除误会；蔡烽火等在班茶，张云、彭汉强、张伟等在双溪渊、武吉茹嫩，黄志成等在吉北马来农村，通过做好村长的思想工作，平息一些萌芽状态中的排华风波，挫败英帝的民族分化阴谋。9月，高渊港口少数马来人受到煽动，藉口一个曾经带领日军杀害华侨的哈吉（到过麦加朝圣的回教徒）被枪杀，准备发动排华。驻高渊的抗日军代表王云，通过人民自治会召集各族头面人物开会，分赴各马来农村游说劝解（高渊各商店分摊哈吉家属办后事等费用），化解一场民族间流血冲突。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诡计，在全马各地，都是依靠马华各族明智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分别被及时制止或较快地消弭。

军事管制政府蛮横撤销各地人民委员会以后，在新加坡

和吉隆坡制导虚假的“民主”，设立咨询委员会，招揽各民族知名人士，编演“征询民意”丑剧。征询内容，局限于社会行政琐碎事务。阿罗斯打开过几次咨询会议，以马来王族、知识界、宗教人士为主的代表，尖锐提出自治问题，军管州政府长官采用搪塞敷衍推诿方法，强调将按英国殖民部所拟计划，新加坡独自成为皇家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及9州成立马来亚联邦。这当然要激起吉玻各族人民普遍的愤慨与不满。

从1945年9月份军管会成立以后，就在各地开始逮捕抗日群众和后备队员，人民抗日军复员以后，吉打州有10几个原抗日战士与后备队员就匿居农村以逃避军警搜捕，在两个月内全马就有几十个人民抗日军战士被捕（注⑦）。英勇的抗日战士辉煌和朱高，先后被捕并驱逐出境，引发吉打州人民抗日军退伍战士两次在阿罗斯打游行抗议。

形势非常严峻，人民抗日胜利果实即将为英帝国主义全面掠夺。然而马来亚共产党在内奸特务莱特的操纵欺骗下，在日本投降后10天，就制订了严重右倾的政治纲领“八大主张”。顺理成章，3个月后，就接受英国军事管制政府关于解散全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计划，命令8个独立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公开复员的准备工作。

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在组织全体战士对复员问题进行讨论时，虽然对“群众希望和平，武装抗日任务已经完成”的提法有些迷惑，但对容忍英帝国主义殖民者继续统治马来亚，将几年流血牺牲得来不易的人民自由权益，及长年艰苦奋斗换来的人民武装轻易放弃，自毁长城，普遍表示无法理解，不少战士当场伤心流泪。大部分指战员，感受到很大压力，虽然不愿缴械复员，却难违抗军委命令，既难说服自己，又难

孤立行动。

战士们借着演习机会，大量消耗子弹，发泄愤懑心情。由于在长期集体战斗中，养成自觉的组织观念和纪律意识，加以政治修养不成熟，缺乏复杂的政治斗争经验，造成指战员们尽管互发牢骚，却没有发生重大的抗拒行动。一些武器，包括来福枪、三八式步枪、卡宾枪、斯汀枪、手榴弹、子弹，被装入大油桶或用油布包裹，分散埋藏在吉北、吉南、吉中、吉东各地。这是英帝国主义反动的殖民政策高压底下的合理反应。

11月24日，第八独立队司令部及所属4个中队的全体指战员，全部集中到阿罗斯打西北面甲抛拉巴底（Kepala Batas）飞机场内兵营，周围都是廓尔喀雇佣兵营地。非常明显，英帝国主义者对人民抗日军始终保持高度敌意与警惕。英国本土的士兵，照例是驻防在比较安全的后方。

1945年12月1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八独立队全体战士，乘坐十多辆大货车到阿罗斯打市内市政局广场，举行最后一次检阅，举行简单复员仪式，又乘原车回归飞机场兵营。全体指战员随即逐个交出随身的武器、卡宾枪、斯汀枪、手枪、轻机枪等轻武器500多件，手榴弹及子弹40000多发，由英籍军官登记接收，每人发给复员费350元。

半小时后，在兵营中召开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吉打州会成立大会，何小力致词，强调放下武器后，将要迎接更加艰巨的和平斗争，号召全体退伍同志回归社会后要加强团结，为争取马来亚各族人民的民主自由而继续奋斗。由于何小力将调任外地，大会选出会长白丝木、副会长江海、戴翔、常务秘书文训，其他常委7人。退伍战士每人捐献100元

为退伍同志会开办基金，个别人捐献了绝大部分复员费。

吉玻两州以 700 多名马来亚共产党员为骨干，团结了 500 多名退伍同志，3000 多名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员，3 万多名有组织的进步工人、农民、妇女和青年学生，从此迈步走上争取民主自由、反对英帝殖民统治的新斗争历程（注⑧）。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广州

注①马来亚联合邦 1947 年人口普查统计：吉打州总人口 554441 人，其中马来人 373183 人，华人 115928 人；玻璃市州总人口 70490 人，其中马来人 55096 人，华人 11788 人。吉玻两州总人口比 1931 年人口普查人数增加 50.4%。日本投降后，吉玻两州的华人出于经商与就业考虑，而且两州粮食优势也相对减弱，部分已迁居檳城，新加坡和马来亚内陆商业繁盛各地。

注②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近 10 年，已在马来亚各地开展周密深入的情报工作，除绘制详细地图外，还广泛调查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间谍网络，遍布各地。1941 年 9 月，日本参谋本部藤原少佐奉命组织南方工作机关，进一步加强谍报工作，召集陆军中野学校优秀的毕业军官，东京外语学校印度语系学生，及神户商业大学出身的年轻士官，全部化名潜入曼谷，在当地日本商社任职，开展间谍活动。又从各地搜罗熟悉广东闽南方言和马来话的日本人（包括台湾人），乔装商社社员、照像师、理发师，分配到新加坡、马来亚各地活动。此举已是临战前的补充安排。谭拔群则是事前早已潜伏的特务之一，原籍海南，小名学耀，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早已参加中国国民党，长期隐瞒政治历史，伪装进步，打入进步社团工作，佯扮积极抗日，参加陈嘉庚率领的回国慰问团，窥窃中国抗战后方机密。吉打沦陷后，双溪大年日本宪兵头子，即用汽车亲接谭拔群到宪兵部工作，并兼翻译。带领日军逮捕马共党员数人，亲自审问爱国华侨，其中由谭先后经手参予判决枪毙 4 人，绞死 1 人，放火烧死 1 人，狱中病饿而死 1 人。日本一宣布投降，谭即溜往新加坡，逃避人民抗日。

军别动队的惩罚，向友人自称是“忠实的国民党员”，旋即飞往中国重庆。

注③暹罗王国于 1025 年曾经征服马来半岛北部地区；1785 年暹兵又进占吉打、吉兰丹、丁加奴等地。1842 年玻璃市从吉打分裂出去。英国于 1909 年和暹罗签订曼谷条约，暹罗将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等 4 州的宗主权移交给英国。1939 年暹罗改名泰国。1943 年日本形式上将吉打、玻璃市、吉兰丹、丁加奴等 4 州割让给泰国（吉玻两州改名西武里），是将查披汶独裁统治下的泰国进一步栓紧在日本的侵略战车上，加深泰马民族的矛盾，便于分而控制和治理。割让后，日军在 4 州的军事政治控制不变，泰国接管行政管理，民事法院、治安警察与教育卫生等系统，经济还是由日本垄断资本所操纵。这 4 个州的马来民族（99%是回教徒），在历史上对暹罗王国（绝大部分泰族是佛教徒）的入侵与不稳定统治，多怀不满与敌意，而 4 个州的警察基本上都是马来人，所以部分警察对抗日活动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注④13 个向人民抗日军投诚的日军，在反对英帝殖民统治斗争中，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做过一些好事。1947 年由长宏、李水等从茹嫩带往纯笃，再由黄安（卢能）、陈源安排生活、带到矿场当零工。抗英战争爆发后，他们帮助抗英战士修复各种枪械、机件，为战士医疗疾病与枪伤，指导解放军战士军事操练。1948 年就参加伏击英军的指挥和作战。在几次作战中，荣光、红光等 4 名日军战士英勇献身。由于马来亚联合邦已经成立，不久，先是贵

龙徒手走出泰南向警察局自首，由日本驻曼谷大使馆送返日本。1951年，金枝等人先后空手于昔罗县向泰国警方自首，被解递马来亚政府后，才遣送回日本。只有田中清明和桥本惠（可能是清德与红星，分别为74和69岁）坚持到1989年12月2日，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来西亚政府及泰国政府签订和平协议后，才由日本驻泰国大使馆送归日本。

注⑤1946年3月，第二批华侨抗日军（150名左右）复员后，少数劣性不改的匪徒，流窜到吉打北部加基武吉一带，打家劫舍，强奸妇女，群众向马共吉北组织，提出强烈要求，区委即调刘强华、彭汉强等6人，在当地地下武装人员配合下，进行追踪清剿，先后击毙匪首2名，匪徒8名，其他匪徒逃往勿洞宜力一带，继续为非作歹，残害群众。1950年，应群众要求，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八支队第七独立分队，由代理政委张伟指挥，将17名盗匪全部围歼于勿洞地区。

注⑥马来亚共产党1945年8月25日中北马党军会议提出《八大主张》：完全撤销《九大纲领》“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和“改编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防军”的主张，改为软弱的要求。一、拥护中苏美英民主国联盟，拥护国际和平组织：——联合国。二、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全马各民族，各抗日党派普选的民意机关。三、废除日本统治的一切机构及其一切法令、法律。四、实现言论、出版、组织、集会、信仰的绝对自由。五、振兴工商业，改善民生，加饷加薪，救济失业和难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六、实行民主教育，废除旧教育，用各民族语言，发

展民族文化。七、平抑物价，审判贪官污吏和投机黑市分子。八、优待抗日士兵，救济死亡将士家属。

注⑦据英国巴素博士 (Victor Purcell) 著《东南亚之华侨》记载：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复员后两个月内，全马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被捕人数近 30 人。“英国对于华侨的政策，许多年来均以时常接近敌视边沿的怀疑态度为其特点”。英帝国主义的镇压矛头，主要对准反对殖民统治最坚决的马来亚共产党和斗争性比较坚强的抗日退伍战士。

注⑧ 抗日战争警醒和激发马来亚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日本投降以后，各民族的政党相继成立，共同的斗争目标，是争取马来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马来亚的民主自由和独立。马来亚国民党 (Parta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由布哈努丁博士领导，于 1945 年 11 月 30 日在怡保成立；马来亚民主同盟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由菲立·何亚琳及约翰·伊伯领导，于 1945 年 12 月 21 日在新加坡成立。以半岛马来人运动与雪兰莪马来学会为主召开泛马马来民族大会，由拿督翁领导，于 1946 年 5 月 11 日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 (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 UMNO)。大部分华侨最初眷恋中国国籍，直至 1949 年 2 月 27 日，才由陈祯禄、杨旭龄、李孝式等 16 人倡导成立马华公会。印度侨民主要关心印度的独立解放，所以印度国大党马来亚分部对马来亚政制的斗争，不够积极。

1946 年 1 月 23 日，英国公布马来亚政制白皮书，实行马来亚联邦 (包括马来 9 个土邦及檳城、马六甲

前海峡殖民地)与皇家殖民地新加坡分治,马来各邦的最高统辖权力归由英皇委派的马来亚联邦总督。受到各民族人民、各政党与社团普遍的强烈反对,也刺激和催促了巫统的成立。英国政府基于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大力扶持马来民族封建、宗教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右翼力量,极力压抑各民族反对殖民统治残余的左翼力量。

1946年12月14日,由马来亚民主同盟、马来亚国民党、马来人祖国青年协会、马来青年党、马来亚共产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马来亚职工联合总会、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中华总商会等11个政党和社团,联合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22日改名泛马行动委员会(Pan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提出新政制建议。英国政府不理联合行动的建议。泛马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10月20日,在全马范围内发动罢工罢市。狡猾的英国政府,于1948年2月1日,宣布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使反对联合邦政制的民主运动,被迫暂时陷于低潮。

英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无可奈何花落去。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在马来亚施虐176年之后,英国殖民者,不得不伤心丧气,凄然西归。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日广州

跋

人类是既文明又野蛮，既聪明又愚笨的高级动物。日本军国主义者，梦想实现“八弦一字”，统治全世界，“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初步图谋。为实现狂妄野心，1931年侵略中国东三省，1937年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马来亚，野蛮残暴，烧杀奸淫抢掠，甚于野兽，造成东亚4500万无辜人民伤亡。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本国人民受尽苦辛，伤亡200多万人，经济濒临崩溃，最后终于力竭投降。野蛮与愚蠢程度，不比史前原始氏族逊色。

《吉玻星火》虽只记述日军侵略暴行的牛腿一毛，但已可反映出日军侵略战争滔天罪行的一般，同时反映出人民不可欺侮的历史发展定律。

日本战败投降已经50周年，然而，相当大量的日本右派分子和内阁军国主义残余成员，却歪曲历史，颠倒黑白，诡称日本没有投降，只是终战；胡说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是把东亚人民从白人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正义”战争；狡辩抵赖到处烧杀奸淫抢掠，和将被侵略人民作细菌战试验等等严重罪恶。欺瞒日本人民，蒙蔽年轻一代，妄图重温“八弦一字”的迷梦。包括马来亚和新加坡在内的东亚人民，不能不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保持高度警惕，努力加强经济、

科技文化和国防建设，增强自卫物质力量，紧记落后导致挨打的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及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作出贡献。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正确认识 and 对待历史，以便明确奋斗与发展方向。从此角度观察，《吉玻星火》起着警钟长鸣，震聋启聩的作用，有着一定的存史、资治、教化价值。

在反抗侵略和反对殖民统治的坚毅斗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用鲜血激发马来亚各族人民自主自立自强的民族主义思潮，唤起反殖斗争的觉醒，为马来亚与新加坡的独立运动当上先头部队，为新马的历史增添光彩。幸存者及后继者，应以共同事业为重，摒弃余念，求同存异，奋发图强，协力为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繁荣昌盛，为两国人民的幸福和进步，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洪雅玲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五

参加座谈或提供亲身抗日经历资料的老战士

陈春梅 (女)	黄 安	陈 斌	赖金锋
王海志	彭汉强	张石头	黄志成
庄健英 (女)	陈海汀	林 风	伍仙护
梁 良 (女)	许明耀	郑开兴	董苏泉
刘来芝	陈亚辉	钟子路	林坤山
赖成就	林 钦	练亚发	蔡育生
方克明	陈德康	陈毓光	陈有为
吴月娥 (女)	黄 仁	林 牧	饶子贞
陈明杰	文 训	蒋成发	

吉打州玻璃市州及檳城市部分抗日烈士名录

陈炳宏	陈文燕 (女)	白 杨	小 周	杨 克
傅亚宁	黄玉心 (女)	胡 棠	肖亚河	饶螺珠
苏乌马	黄庚凤 (女)	方壮志	阿 岳	黄 秀
何 镛	陈凤娥 (女)	何亚泉	郑慈来	谢维汉
梁廷业	陈珍友 (女)	阿 初	阿 冰	小 波
庄学社	钟才妹 (女)	黄文章	刘 刚	陈克俊
徐振忠	陈穷农	老 顾	许逸似	梁栋材
叶向荣	李晚来	蔡有松	柯连务	丘丕芬
陆 伍	鲁沙子	许福泰	庄锡祉	林 城
张桂光	张桂才	巴 舌	陈焕南	许福炎
亚 春	陈福泰	陈焰福	蔡传有	蔡炳乾
黄和龙	邱 习	张 昌	江春和	万 思
钟 松	陈天才	邝亚增	王登富	陈世坚
张 拔	郭适存			